



(2024 年 1 月，第一期)

编委会

主 编：屠磊

副主编：丁峰、王竞、刘蓉蓉

责任编辑：刘蓉蓉、徐红梅

目录

一、新法速递.....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3
二、观点速递.....	48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惩治伪造公司、企业印章等破坏营商环境犯罪典型案例	
——摘自微信《最高人民检察院》	48
三、实务研究.....	53
关于当前民商事审判工作的几点思考 文 刘贵祥	
——摘自《中国应运法学》2023 年第 6 期）	53
李建伟 新公司法将对资本市场产生积极影响	
——摘自《证券日报》	82
《公司法》修订解读及法律全文	
——摘自微信《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案例研究院》	85

一、新法速递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

（1993 年 12 月 29 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通过 根据 1999 年 12 月 25 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决定》第一次修正 根据 2004 年 8 月 28 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决定》第二次修正 2005 年 10 月 27 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第一次修订 根据 2013 年 12 月 28 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等七部法律的决定》第三次修正 根据 2018 年 10 月 26 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决定》第四次修正 2023 年 12 月 29 日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第二次修订）

目录

第一章 总则

第二章 公司登记

第三章 有限责任公司的设立和 组织机构

第一节 设立

第二节 组织机构

第四章 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转 让

第五章 股份有限公司的设立和 组织机构

第一节 设立

第二节 股 东 会

第三节 董事会、经理

第四节 监 事 会

第五节 上市公司组织机构的特 别规定

第六章 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发 行和转让

第一节 股份发行

第二节 股份转让

第七章 国家出资公司组织机构 的特别规定

第八章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资格和义务

第九章 公司债券

第十章 公司财务、会计

第十一章 公司合并、分立、增资、减资

第十二章 公司解散和清算

第十三章 外国公司的分支机构

第十四章 法律责任

第十五章 附则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公司的组织和行为,保护公司、股东、职工和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弘扬企业家精神,维护社会经济秩序,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根据宪法,制定本法。

第二条 本法所称公司,是指依照本法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条 公司是企业法人,有独立的法人财产,享有法人财产权。公司以其全部财产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

公司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不受侵犯。

第四条 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以其认购的股份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

公司股东对公司依法享有资产收益、参与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权利。

第五条 设立公司应当依法制定公司章程。公司章程对公司、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具有约束力。

第六条 公司应当有自己的名称。公司名称应当符合国家有关规定。

公司的名称权受法律保护。

第七条 依照本法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应当在公司名称中标明有限责任公司或者有限公司字样。

依照本法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应当在公司名称中标明股份有限公司或者股份公司字样。

第八条 公司以其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为住所。

第九条 公司的经营范围由公司章程规定。公司可以修改公司章程,变更经营范围。

公司的经营范围中属于法律、行政法规规定须经批准的项目，应当依法经过批准。

第十条 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按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代表公司执行公司事务的董事或者经理担任。

担任法定代表人的董事或者经理辞任的，视为同时辞去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辞任的，公司应当在法定代表人辞任之日起三十日内确定新的法定代表人。

第十一条 法定代表人以公司名义从事的民事活动，其法律后果由公司承受。

公司章程或者股东会对法定代表人职权的限制，不得对抗善意相对人。

法定代表人因执行职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公司承担民事责任。公司承担民事责任后，依照法律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可以向有过错的法定代表人追偿。

第十二条 有限责任公司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应当符合本法规定的股份有限公司的条件。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应当符合本法规定的有限责任公司的条件。

有限责任公司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的，或者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的，公司变更前的债权、债务由变更后的公司承继。

第十三条 公司可以设立子公司。子公司具有法人资格，依法独立承担民事责任。

公司可以设立分公司。分公司不具有法人资格，其民事责任由公司承担。

第十四条 公司可以向其他企业投资。

法律规定公司不得成为对所投资企业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出资人的，从其规定。

第十五条 公司向其他企业投资或者为他人提供担保，按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会或者股东会决议；公司章程对投资或者担保的总额及单项投资或者担保的数额有限额规定的，不得超过规定的限额。

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应当经股东会决议。

前款规定的股东或者受前款规定的实际控制人支配的股东，不得参加前款规定事项的表决。该项表决由出

席会议的其他股东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

第十六条 公司应当保护职工的合法权益，依法与职工签订劳动合同，参加社会保险，加强劳动保护，实现安全生产。

公司应当采用多种形式，加强公司职工的职业教育和岗位培训，提高职工素质。

第十七条 公司职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组织工会，开展工会活动，维护职工合法权益。公司应当为本公司工会提供必要的活动条件。公司工会代表职工就职工的劳动报酬、工作时间、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和保险福利等事项依法与公司签订集体合同。

公司依照宪法和有关法律的规定，建立健全以职工代表大会为基本形式的民主管理制度，通过职工代表大会或者其他形式，实行民主管理。

公司研究决定改制、解散、申请破产以及经营方面的重大问题、制定重要的规章制度时，应当听取公司工会的意见，并通过职工代表大会或者其他形式听取职工的意见和建议。

第十八条 在公司中，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的规定，设立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开展党的活动。公司应当为党组织的活动提供必要条件。

第十九条 公司从事经营活动，应当遵守法律法规，遵守社会公德、商业道德，诚实守信，接受政府和社会公众的监督。

第二十条 公司从事经营活动，应当充分考虑公司职工、消费者等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以及生态环境保护等社会公共利益，承担社会责任。

国家鼓励公司参与社会公益活动，公布社会责任报告。

第二十一条 公司股东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依法行使股东权利，不得滥用股东权利损害公司或者其他股东的利益。

公司股东滥用股东权利给公司或者其他股东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第二十二条 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利用关联关系损害公司利益。

违反前款规定，给公司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第二十三条 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股东利用其控制的两个以上公司实施前款规定行为的，各公司应当对任一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只有一个股东的公司，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第二十四条 公司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召开会议和表决可以采用电子通信方式，公司章程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二十五条 公司股东会、董事会的决议内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无效。

第二十六条 公司股东会、董事会的会议召集程序、表决方式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或者决议内容违反公司章程的，股东自决议作出之日起六十日内，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但是，股东会、董事会的会议召集程序或者表决方式仅有轻微瑕疵，对决议未产生实质影响的除外。

未被通知参加股东会会议的股东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股东会决议作出之日起六十日内，可以请求人民法院

撤销；自决议作出之日起一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的，撤销权消灭。

第二十七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司股东会、董事会的决议不成立：

（一）未召开股东会、董事会会议作出决议；

（二）股东会、董事会会议未对决议事项进行表决；

（三）出席会议的人数或者所持表决权数未达到本法或者公司章程规定的人数或者所持表决权数；

（四）同意决议事项的人数或者所持表决权数未达到本法或者公司章程规定的人数或者所持表决权数。

第二十八条 公司股东会、董事会决议被人民法院宣告无效、撤销或者确认不成立的，公司应当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撤销根据该决议已办理的登记。

股东会、董事会决议被人民法院宣告无效、撤销或者确认不成立的，公司根据该决议与善意相对人形成的民事法律关系不受影响。

第二章 公司登记

第二十九条 设立公司，应当依法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设立登记。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设立公司必须报经批准的，应当在公司登记前依法办理批准手续。

第三十条 申请设立公司，应当提交设立登记申请书、公司章程等文件，提交的相关材料应当真实、合法和有效。

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公司登记机关应当一次性告知需要补正的材料。

第三十一条 申请设立公司，符合本法规定的设立条件的，由公司登记机关分别登记为有限责任公司或者股份有限公司；不符合本法规定的设立条件的，不得登记为有限责任公司或者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十二条 公司登记事项包括：

（一）名称；

（二）住所；

（三）注册资本；

（四）经营范围；

（五）法定代表人的姓名；

（六）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股份有限公司发起人的姓名或者名称。

公司登记机关应当将前款规定的公司登记事项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社会公示。

第三十三条 依法设立的公司，由公司登记机关发给公司营业执照。公司营业执照签发日期为公司成立日期。

公司营业执照应当载明公司的名称、住所、注册资本、经营范围、法定代表人姓名等事项。

公司登记机关可以发给电子营业执照。电子营业执照与纸质营业执照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第三十四条 公司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依法办理变更登记。

公司登记事项未经登记或者未经变更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相对人。

第三十五条 公司申请变更登记，应当向公司登记机关提交公司法定代表人签署的变更登记申请书、依法作出的变更决议或者决定等文件。

公司变更登记事项涉及修改公司章程的，应当提交修改后的公司章程。

公司变更法定代表人的，变更登记申请书由变更后的法定代表人签署。

第三十六条 公司营业执照记载的事项发生变更的，公司办理变更登记后，由公司登记机关换发营业执照。

第三十七条 公司因解散、被宣告破产或者其他法定事由需要终止的，应当依法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由公司登记机关公告公司终止。

第三十八条 公司设立分公司，应当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登记，领取营业执照。

第三十九条 虚报注册资本、提交虚假材料或者采取其他欺诈手段隐瞒重要事实取得公司设立登记的，公司登记机关应当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予以撤销。

第四十条 公司应当按照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示下列事项：

（一）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认缴和实缴的出资额、出资方式和出资日期，股份有限公司发起人认购的股份数；

（二）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股份有限公司发起人的股权、股份变更信息；

（三）行政许可取得、变更、注销等信息；

（四）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信息。

公司应当确保前款公示信息真实、准确、完整。

第四十一条 公司登记机关应当优化公司登记办理流程，提高公司登记效率，加强信息化建设，推行网上办理等便捷方式，提升公司登记便利化水平。

国务院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根据本法和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制定公司登记注册的具体办法。

第三章 有限责任公司的设立和组织机构

第一节 设立

第四十二条 有限责任公司由一个以上五十个以下股东出资设立。

第四十三条 有限责任公司设立时的股东可以签订设立协议，明确各自在公司设立过程中的权利和义务。

第四十四条 有限责任公司设立时的股东为设立公司从事的民事活动，其法律后果由公司承受。

公司未成立的，其法律后果由公司设立时的股东承受；设立时的股东

为二人以上的，享有连带债权，承担连带债务。

设立时的股东为设立公司以自己的名义从事民事活动产生的民事责任，第三人有权选择请求公司或者公司设立时的股东承担。

设立时的股东因履行公司设立职责造成他人损害的，公司或者无过错的股东承担赔偿责任后，可以向有过错的股东追偿。

第四十五条 设立有限责任公司，应当由股东共同制定公司章程。

第四十六条 有限责任公司章程应当载明下列事项：

- （一）公司名称和住所；
- （二）公司经营范围；
- （三）公司注册资本；
- （四）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
- （五）股东的出资额、出资方式 and 出资日期；
- （六）公司的机构及其产生办法、职权、议事规则；
- （七）公司法定代表人的产生、变更办法；

（八）股东会认为需要规定的其他事项。

股东应当在公司章程上签名或者盖章。

第四十七条 有限责任公司的注册资本为在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全体股东认缴的出资额。全体股东认缴的出资额由股东按照公司章程的规定自公司成立之日起五年内缴足。

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国务院决定对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实缴、注册资本最低限额、股东出资期限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四十八条 股东可以用货币出资，也可以用实物、知识产权、土地使用权、股权、债权等可以用货币估价并可以依法转让的非货币财产作价出资；但是，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不得作为出资的财产除外。

对作为出资的非货币财产应当评估作价，核实财产，不得高估或者低估作价。法律、行政法规对评估作价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四十九条 股东应当按期足额缴纳公司章程规定的各自所认缴的出资额。

股东以货币出资的，应当将货币出资足额存入有限责任公司在银行开设的账户；以非货币财产出资的，应当依法办理其财产权的转移手续。

股东未按期足额缴纳出资的，除应当向公司足额缴纳外，还应当对给公司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第五十条 有限责任公司设立时，股东未按照公司章程规定实际缴纳出资，或者实际出资的非货币财产的实际价额显著低于所认缴的出资额的，设立时的其他股东与该股东在出资不足的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

第五十一条 有限责任公司成立后，董事会应当对股东的出资情况进行核查，发现股东未按期足额缴纳公司章程规定的出资的，应当由公司向该股东发出书面催缴书，催缴出资。

未及时履行前款规定的义务，给公司造成损失的，负有责任的董事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第五十二条 股东未按照公司章程规定的出资日期缴纳出资，公司依照前条第一款规定发出书面催缴书催缴出资的，可以载明缴纳出资的宽限期；宽限期自公司发出催缴书之日起，不得少于六十日。宽限期届满，股

东仍未履行出资义务的，公司经董事会决议可以向该股东发出失权通知，通知应当以书面形式发出。自通知发出之日起，该股东丧失其未缴纳出资的股权。

依照前款规定丧失的股权应当依法转让，或者相应减少注册资本并注销该股权；六个月内未转让或者注销的，由公司其他股东按照其出资比例足额缴纳相应出资。

股东对失权有异议的，应当自接到失权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五十三条 公司成立后，股东不得抽逃出资。

违反前款规定的，股东应当返还抽逃的出资；给公司造成损失的，负有责任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与该股东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第五十四条 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的，公司或者已到期债权的债权人有权要求已认缴出资但未届出资期限的股东提前缴纳出资。

第五十五条 有限责任公司成立后，应当向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下列事项：

(一) 公司名称;

(二) 公司成立日期;

(三) 公司注册资本;

(四) 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认缴和实缴的出资额、出资方式和出资日期;

(五) 出资证明书的编号和核发日期。

出资证明书由法定代表人签名,并由公司盖章。

第五十六条 有限责任公司应当置备股东名册,记载下列事项:

(一) 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及住所;

(二) 股东认缴和实缴的出资额、出资方式和出资日期;

(三) 出资证明书编号;

(四) 取得和丧失股东资格的日期。

记载于股东名册的股东,可以依股东名册主张行使股东权利。

第五十七条 股东有权查阅、复制公司章程、股东名册、股东会会议记录、董事会会议决议、监事会会议决议和财务会计报告。

股东可以要求查阅公司会计账簿、会计凭证。股东要求查阅公司会计账簿、会计凭证的,应当向公司提出书面请求,说明目的。公司有合理根据认为股东查阅会计账簿、会计凭证有不正当目的,可能损害公司合法利益的,可以拒绝提供查阅,并应当自股东提出书面请求之日起十五日内书面答复股东并说明理由。公司拒绝提供查阅的,股东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股东查阅前款规定的材料,可以委托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进行。

股东及其委托的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查阅、复制有关材料,应当遵守有关保护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个人信息等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

股东要求查阅、复制公司全资子公司相关材料的,适用前四款的规定。

第二节 组织机构

第五十八条 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会由全体股东组成。股东会是公司的权力机构,依照本法行使职权。

第五十九条 股东会行使下列职权:

(一) 选举和更换董事、监事，决定有关董事、监事的报酬事项；

(二) 审议批准董事会的报告；

(三) 审议批准监事会的报告；

(四) 审议批准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

(五) 对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作出决议；

(六) 对发行公司债券作出决议；

(七) 对公司合并、分立、解散、清算或者变更公司形式作出决议；

(八) 修改公司章程；

(九) 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职权。

股东会可以授权董事会对发行公司债券作出决议。

对本条第一款所列事项股东以书面形式一致表示同意的，可以不召开股东会会议，直接作出决定，并由全体股东在决定文件上签名或者盖章。

第六十条 只有一个股东的有限责任公司不设股东会。股东作出前条第一款所列事项的决定时，应当采用书面形式，并由股东签名或者盖章后置备于公司。

第六十一条 首次股东会会议由出资最多的股东召集和主持，依照本法规定行使职权。

第六十二条 股东会会议分为定期会议和临时会议。

定期会议应当按照公司章程的规定按时召开。代表十分之一以上表决权的股东、三分之一以上的董事或者监事会提议召开临时会议的，应当召开临时会议。

第六十三条 股东会会议由董事会召集，董事长主持；董事长不能履行职务或者不履行职务的，由副董事长主持；副董事长不能履行职务或者不履行职务的，由过半数的董事共同推举一名董事主持。

董事会不能履行或者不履行召集股东会会议职责的，由监事会召集和主持；监事会不召集和主持的，代表十分之一以上表决权的股东可以自行召集和主持。

第六十四条 召开股东会会议，应当于会议召开十五日前通知全体股东；但是，公司章程另有规定或者全体股东另有约定的除外。

股东会应当对所议事项的决定作成会议记录，出席会议的股东应当在会议记录上签名或者盖章。

第六十五条 股东会会议由股东按照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但是，公司章程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六十六条 股东会的议事方式和表决程序，除本法有规定的外，由公司章程规定。

股东会作出决议，应当经代表过半数表决权的股东通过。

股东会作出修改公司章程、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的决议，以及公司合并、分立、解散或者变更公司形式的决议，应当经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

第六十七条 有限责任公司设董事会，本法第七十五条另有规定的除外。

董事会行使下列职权：

（一）召集股东会会议，并向股东会报告工作；

（二）执行股东会的决议；

（三）决定公司的经营计划和投资方案；

（四）制订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

（五）制订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以及发行公司债券的方案；

（六）制订公司合并、分立、解散或者变更公司形式的方案；

（七）决定公司内部管理机构的设置；

（八）决定聘任或者解聘公司经理及其报酬事项，并根据经理的提名决定聘任或者解聘公司副经理、财务负责人及其报酬事项；

（九）制定公司的基本管理制度；

（十）公司章程规定或者股东会授予的其他职权。

公司章程对董事会职权的限制不得对抗善意相对人。

第六十八条 有限责任公司董事会成员为三人以上，其成员中可以有公司职工代表。职工人数三百人以上的有限责任公司，除依法设监事会并有公司职工代表的外，其董事会成员中应当有公司职工代表。董事会中的职工代表由公司职工通过职工代表大会、职工大会或者其他形式民主选举产生。

董事会设董事长一人,可以设副董事长。董事长、副董事长的产生办法由公司章程规定。

第六十九条 有限责任公司可以按照公司章程的规定在董事会中设置由董事组成的审计委员会,行使本法规定的监事会的职权,不设监事会或者监事。公司董事会成员中的职工代表可以成为审计委员会成员。

第七十条 董事任期由公司章程规定,但每届任期不得超过三年。董事任期届满,连选可以连任。

董事任期届满未及时改选,或者董事在任期内辞任导致董事会成员低于法定人数的,在改选出的董事就任前,原董事仍应当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董事职务。

董事辞任的,应当以书面形式通知公司,公司收到通知之日辞任生效,但存在前款规定情形的,董事应当继续履行职务。

第七十一条 股东会可以决议解任董事,决议作出之日解任生效。

无正当理由,在任期届满前解任董事的,该董事可以要求公司予以赔偿。

第七十二条 董事会会议由董事长召集和主持;董事长不能履行职务或者不履行职务的,由副董事长召集和主持;副董事长不能履行职务或者不履行职务的,由过半数的董事共同推举一名董事召集和主持。

第七十三条 董事会的议事方式和表决程序,除本法有规定的外,由公司章程规定。

董事会会议应当有过半数的董事出席方可举行。董事会作出决议,应当经全体董事的过半数通过。

董事会决议的表决,应当一人一票。

董事会应当对所议事项的决定作成会议记录,出席会议的董事应当在会议记录上签名。

第七十四条 有限责任公司可以设经理,由董事会决定聘任或者解聘。

经理对董事会负责,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或者董事会的授权行使职权。经理列席董事会会议。

第七十五条 规模较小或者股东人数较少的有限责任公司,可以不设董事会,设一名董事,行使本法规定的

董事会的职权。该董事可以兼任公司经理。

第七十六条 有限责任公司设监事会，本法第六十九条、第八十三条另有规定的除外。

监事会成员为三人以上。监事会成员应当包括股东代表和适当比例的公司职工代表，其中职工代表的比例不得低于三分之一，具体比例由公司章程规定。监事会中的职工代表由公司职工通过职工代表大会、职工大会或者其他形式民主选举产生。

监事会设主席一人，由全体监事过半数选举产生。监事会主席召集和主持监事会会议；监事会主席不能履行职务或者不履行职务的，由过半数的监事共同推举一名监事召集和主持监事会会议。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兼任监事。

第七十七条 监事的任期每届为三年。监事任期届满，连选可以连任。

监事任期届满未及时改选，或者监事在任期内辞任导致监事会成员低于法定人数的，在改选出的监事就任前，原监事仍应当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监事职务。

第七十八条 监事会行使下列职权：

（一）检查公司财务；

（二）对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执行职务的行为进行监督，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公司章程或者股东会决议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提出解任的建议；

（三）当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行为损害公司的利益时，要求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予以纠正；

（四）提议召开临时股东会会议，在董事会不履行本法规定的召集和主持股东会会议职责时召集和主持股东会会议；

（五）向股东会会议提出提案；

（六）依照本法第一百八十九条的规定，对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提起诉讼；

（七）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职权。

第七十九条 监事可以列席董事会会议，并对董事会决议事项提出质询或者建议。

监事会发现公司经营情况异常，可以进行调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会计师事务所等协助其工作，费用由公司承担。

第八十条 监事会可以要求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提交执行职务的报告。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如实向监事会提供有关情况和资料，不得妨碍监事会或者监事行使职权。

第八十一条 监事会每年度至少召开一次会议，监事可以提议召开临时监事会会议。

监事会的议事方式和表决程序，除本法有规定的外，由公司章程规定。

监事会决议应当经全体监事的过半数通过。

监事会决议的表决，应当一人一票。

监事会应当对所议事项的决定作成会议记录，出席会议的监事应当在会议记录上签名。

第八十二条 监事会行使职权所必需的费用，由公司承担。

第八十三条 规模较小或者股东人数较少的有限责任公司，可以不设监事会，设一名监事，行使本法规定的监事会的职权；经全体股东一致同意，也可以不设监事。

第四章 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转让

第八十四条 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之间可以相互转让其全部或者部分股权。

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的，应当将股权转让的数量、价格、支付方式和期限等事项书面通知其他股东，其他股东在同等条件下有优先购买权。股东自接到书面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内未答复的，视为放弃优先购买权。两个以上股东行使优先购买权的，协商确定各自的购买比例；协商不成的，按照转让时各自的出资比例行使优先购买权。

公司章程对股权转让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八十五条 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的强制执行程序转让股东的股权时，应当通知公司及全体股东，其他股东在同等条件下有优先购买权。其他股东自人民法院通知之日起满二十日不行使优先购买权的，视为放弃优先购买权。

第八十六条 股东转让股权的，应当书面通知公司，请求变更股东名册；需要办理变更登记的，并请求公司向公司登记机关办理变更登记。公司拒绝或者在合理期限内不予答复的，转

让人、受让人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股权转让的，受让人自记载于股东名册时起可以向公司主张行使股东权利。

第八十七条 依照本法转让股权后，公司应当及时注销原股东的出资证明书，向新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并相应修改公司章程和股东名册中有关股东及其出资额的记载。对公司章程的该项修改不需再由股东会表决。

第八十八条 股东转让已认缴出资但未届出资期限的股权的，由受让人承担缴纳该出资的义务；受让人未按期足额缴纳出资的，转让人对受让人未按期缴纳的出资承担补充责任。

未按照公司章程规定的出资日期缴纳出资或者作为出资的非货币财产的实际价额显著低于所认缴的出资额的股东转让股权的，转让人与受让人在出资不足的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受让人不知道且不应知道存在上述情形的，由转让人承担责任。

第八十九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对股东会该项决议投反对票的股东可以请求公司按照合理的价格收购其股权：

（一）公司连续五年不向股东分配利润，而公司该五年连续盈利，并且符合本法规定的分配利润条件；

（二）公司合并、分立、转让主要财产；

（三）公司章程规定的营业期限届满或者章程规定的其他解散事由出现，股东会通过决议修改章程使公司存续。

自股东会决议作出之日起六十日内，股东与公司不能达成股权收购协议的，股东可以自股东会决议作出之日起九十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公司的控股股东滥用股东权利，严重损害公司或者其他股东利益的，其他股东有权请求公司按照合理的价格收购其股权。

公司因本条第一款、第三款规定的情形收购的本公司股权，应当在六个月内依法转让或者注销。

第九十条 自然人股东死亡后，其合法继承人可以继承股东资格；但是，公司章程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五章 股份有限公司的设立和组织机构

第一节 设立

第九十一条 设立股份有限公司，可以采取发起设立或者募集设立的方式。

发起设立，是指由发起人认购设立公司时应发行的全部股份而设立公司。

募集设立，是指由发起人认购设立公司时应发行股份的一部分，其余股份向特定对象募集或者向社会公开募集而设立公司。

第九十二条 设立股份有限公司，应当有一人以上二百人以下发起人，其中应当有半数以上的发起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有住所。

第九十三条 股份有限公司发起人承担公司筹办事务。

发起人应当签订发起人协议，明确各自在公司设立过程中的权利和义务。

第九十四条 设立股份有限公司，应当由发起人共同制订公司章程。

第九十五条 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应当载明下列事项：

- (一) 公司名称和住所；
- (二) 公司经营范围；

(三) 公司设立方式；

(四) 公司注册资本、已发行的股份数和设立时发行的股份数，面额股的每股金额；

(五) 发行类别股的，每一类别股的股份数及其权利和义务；

(六) 发起人的姓名或者名称、认购的股份数、出资方式；

(七) 董事会的组成、职权和议事规则；

(八) 公司法定代表人的产生、变更办法；

(九) 监事会的组成、职权和议事规则；

(十) 公司利润分配办法；

(十一) 公司的解散事由与清算办法；

(十二) 公司的通知和公告办法；

(十三) 股东会认为需要规定的其他事项。

第九十六条 股份有限公司的注册资本为在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已发行股份的股本总额。在发起人认购的股份缴足前，不得向他人募集股份。

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国务院决定对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最低限额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九十七条 以发起设立方式设立股份有限公司的，发起人应当认足公司章程规定的公司设立时应发行的股份。

以募集设立方式设立股份有限公司的，发起人认购的股份不得少于公司章程规定的公司设立时应发行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三十五；但是，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九十八条 发起人应当在公司成立前按照其认购的股份全额缴纳股款。

发起人的出资，适用本法第四十八条、第四十九条第二款关于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出资的规定。

第九十九条 发起人不按照其认购的股份缴纳股款，或者作为出资的非货币财产的实际价额显著低于所认购的股份的，其他发起人与该发起人在出资不足的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

第一百条 发起人向社会公开募集股份，应当公告招股说明书，并制作认股书。认股书应当载明本法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二款、第三款所列事项，

由认股人填写认购的股份数、金额、住所，并签名或者盖章。认股人应当按照所认购股份足额缴纳股款。

第一百零一条 向社会公开募集股份的股款缴足后，应当经依法设立的验资机构验资并出具证明。

第一百零二条 股份有限公司应当制作股东名册并置备于公司。股东名册应当记载下列事项：

（一）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及住所；

（二）各股东所认购的股份种类及股份数；

（三）发行纸面形式的股票的，股票的编号；

（四）各股东取得股份的日期。

第一百零三条 募集设立股份有限公司的发起人应当自公司设立时应发行股份的股款缴足之日起三十日内召开公司成立大会。发起人应当在成立大会召开十五日前将会议日期通知各认股人或者予以公告。成立大会应当有持有表决权过半数的认股人出席，方可举行。

以发起设立方式设立股份有限公司成立大会的召开和表决程序由公司章程或者发起人协议规定。

第一百零四条 公司成立大会行使下列职权：

（一）审议发起人关于公司筹办情况的报告；

（二）通过公司章程；

（三）选举董事、监事；

（四）对公司的设立费用进行审核；

（五）对发起人非货币财产出资的作价进行审核；

（六）发生不可抗力或者经营条件发生重大变化直接影响公司设立的，可以作出不设立公司的决议。

成立大会对前款所列事项作出决议，应当经出席会议的认股人所持表决权过半数通过。

第一百零五条 公司设立时应发行的股份未募足，或者发行股份的股款缴足后，发起人在三十日内未召开成立大会的，认股人可以按照所缴股款并加算银行同期存款利息，要求发起人返还。

发起人、认股人缴纳股款或者交付非货币财产出资后，除未按期募足股份、发起人未按期召开成立大会或者成立大会决议不设立公司的情形外，不得抽回其股本。

第一百零六条 董事会应当授权代表，于公司成立大会结束后三十日内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设立登记。

第一百零七条 本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九条第三款、第五十一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的规定，适用于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百零八条 有限责任公司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时，折合的实收股本总额不得高于公司净资产额。有限责任公司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为增加注册资本公开发行股份时，应当依法办理。

第一百零九条 股份有限公司应当将公司章程、股东名册、股东会会议记录、董事会会议记录、监事会会议记录、财务会计报告、债券持有人名册置备于本公司。

第一百一十条 股东有权查阅、复制公司章程、股东名册、股东会会议记录、董事会会议决议、监事会会议决议、

财务会计报告，对公司的经营提出建议或者质询。

连续一百八十日以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百分之三以上股份的股东要求查阅公司的会计账簿、会计凭证的，适用本法第五十七条第二款、第三款、第四款的规定。公司章程对持股比例有较低规定的，从其规定。

股东要求查阅、复制公司全资子公司相关材料的，适用前两款的规定。

上市公司股东查阅、复制相关材料的，应当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

第二节 股东会

第一百一十一条 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会由全体股东组成。股东会是公司的权力机构，依照本法行使职权。

第一百一十二条 本法第五十九条第一款、第二款关于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会职权的规定，适用于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会。

本法第六十条关于只有一个股东的有限责任公司不设股东会的规定，适用于只有一个股东的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百一十三条 股东会应当每年召开一次年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在两个月内召开临时股东会会议：

（一）董事人数不足本法规定人数或者公司章程所定人数的三分之二时；

（二）公司未弥补的亏损达股本总额三分之一时；

（三）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百分之十以上股份的股东请求时；

（四）董事会认为必要时；

（五）监事会提议召开时；

（六）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一百一十四条 股东会会议由董事会召集，董事长主持；董事长不能履行职务或者不履行职务的，由副董事长主持；副董事长不能履行职务或者不履行职务的，由过半数的董事共同推举一名董事主持。

董事会不能履行或者不履行召集股东会会议职责的，监事会应当及时召集和主持；监事会不召集和主持的，连续九十日以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百分之十以上股份的股东可以自行召集和主持。

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百分之十以上股份的股东请求召开临时股东会会议的，董事会、监事会应当在收到请求之日起十日内作出是否召开临时股东会会议的决定，并书面答复股东。

第一百一十五条 召开股东会会议，应当将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和审议的事项于会议召开二十日前通知各股东；临时股东会会议应当于会议召开十五日前通知各股东。

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百分之十以上股份的股东，可以在股东会会议召开十日前提出临时提案并书面提交董事会。临时提案应当有明确议题和具体决议事项。董事会应当在收到提案后二日内通知其他股东，并将该临时提案提交股东会审议；但临时提案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或者不属于股东会职权范围的除外。公司不得提高提出临时提案股东的持股比例。

公开发行股份的公司，应当以公告方式作出前两款规定的通知。

股东会不得对通知中未列明的事项作出决议。

第一百一十六条 股东出席股东会会议，所持每一股份有一表决权，类

别股股东除外。公司持有的本公司股份没有表决权。

股东会作出决议，应当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过半数通过。

股东会作出修改公司章程、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的决议，以及公司合并、分立、解散或者变更公司形式的决议，应当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第一百一十七条 股东会选举董事、监事，可以按照公司章程的规定或者股东会的决议，实行累积投票制。

本法所称累积投票制，是指股东会选举董事或者监事时，每一股份拥有与应选董事或者监事人数相同的表决权，股东拥有的表决权可以集中使用。

第一百一十八条 股东委托代理人出席股东会会议的，应当明确代理人代理的事项、权限和期限；代理人应当向公司提交股东授权委托书，并在授权范围内行使表决权。

第一百一十九条 股东会应当对所议事项的决定作成会议记录，主持人、出席会议的董事应当在会议记录上签名。会议记录应当与出席股东的签名册及代理出席的委托书一并保存。

第三节 董事会、经理

第一百二十条 股份有限公司设董事会，本法第一百二十八条另有规定的除外。

本法第六十七条、第六十八条第一款、第七十条、第七十一条的规定，适用于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百二十一条 股份有限公司可以按照公司章程的规定在董事会中设置由董事组成的审计委员会，行使本法规定的监事会的职权，不设监事会或者监事。

审计委员会成员为三名以上，过半数成员不得在公司担任除董事以外的其他职务，且不得与公司存在任何可能影响其独立客观判断的关系。公司董事会成员中的职工代表可以成为审计委员会成员。

审计委员会作出决议，应当经审计委员会成员的过半数通过。

审计委员会决议的表决，应当一人一票。

审计委员会的议事方式和表决程序，除本法有规定的外，由公司章程规定。

公司可以按照公司章程的规定在董事会中设置其他委员会。

第一百二十二条 董事会设董事长一人，可以设副董事长。董事长和副董事长由董事会以全体董事的过半数选举产生。

董事长召集和主持董事会会议，检查董事会决议的实施情况。副董事长协助董事长工作，董事长不能履行职务或者不履行职务的，由副董事长履行职务；副董事长不能履行职务或者不履行职务的，由过半数的董事共同推举一名董事履行职务。

第一百二十三条 董事会每年度至少召开两次会议，每次会议应当于会议召开十日前通知全体董事和监事。

代表十分之一以上表决权的股东、三分之一以上董事或者监事会，可以提议召开临时董事会会议。董事长应当自接到提议后十日内，召集和主持董事会会议。

董事会召开临时会议，可以另定召集董事会的通知方式和通知时限。

第一百二十四条 董事会会议应当有过半数的董事出席方可举行。董事会作出决议，应当经全体董事的过半数通过。

董事会决议的表决，应当一人一票。

董事会应当对所议事项的决定作成会议记录，出席会议的董事应当在会议记录上签名。

第一百二十五条 董事会会议，应当由董事本人出席；董事因故不能出席，可以书面委托其他董事代为出席，委托书应当载明授权范围。

董事应当对董事会的决议承担责任。董事会的决议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股东会决议，给公司造成严重损失的，参与决议的董事对公司负赔偿责任；经证明在表决时曾表明异议并记载于会议记录的，该董事可以免除责任。

第一百二十六条 股份有限公司设经理，由董事会决定聘任或者解聘。

经理对董事会负责，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或者董事会的授权行使职权。经理列席董事会会议。

第一百二十七条 公司董事会可以决定由董事会成员兼任经理。

第一百二十八条 规模较小或者股东人数较少的股份有限公司，可以不设董事会，设一名董事，行使本法规

定的董事会的职权。该董事可以兼任公司经理。

第一百二十九条 公司应当定期向股东披露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从公司获得报酬的情况。

第四节 监事会

第一百三十条 股份有限公司设监事会，本法第一百二十一条第一款、第一百三十三条另有规定的除外。

监事会成员为三人以上。监事会成员应当包括股东代表和适当比例的公司职工代表，其中职工代表的比例不得低于三分之一，具体比例由公司章程规定。监事会中的职工代表由公司职工通过职工代表大会、职工大会或者其他形式民主选举产生。

监事会设主席一人，可以设副主席。监事会主席和副主席由全体监事过半数选举产生。监事会主席召集和主持监事会会议；监事会主席不能履行职务或者不履行职务的，由监事会副主席召集和主持监事会会议；监事会副主席不能履行职务或者不履行职务的，由过半数的监事共同推举一名监事召集和主持监事会会议。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兼任监事。

本法第七十七条关于有限责任公司监事任期的规定，适用于股份有限公司监事。

第一百三十一条 本法第七十八条至第八十条的规定，适用于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监事会行使职权所必需的费用，由公司承担。

第一百三十二条 监事会每六个月至少召开一次会议。监事可以提议召开临时监事会会议。

监事会的议事方式和表决程序，除本法有规定的外，由公司章程规定。

监事会决议应当经全体监事的过半数通过。

监事会决议的表决，应当一人一票。

监事会应当对所议事项的决定作成会议记录，出席会议的监事应当在会议记录上签名。

第一百三十三条 规模较小或者股东人数较少的股份有限公司，可以不设监事会，设一名监事，行使本法规定的监事会的职权。

第五节 上市公司组织机构的特别规定

第一百三十四条 本法所称上市公司，是指其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的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百三十五条 上市公司在一年内购买、出售重大资产或者向他人提供担保的金额超过公司资产总额百分之三十的，应当由股东会作出决议，并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第一百三十六条 上市公司设独立董事，具体管理办法由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规定。

上市公司的公司章程除载明本法第九十五条规定的事项外，还应当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载明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的组成、职权以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考核机制等事项。

第一百三十七条 上市公司在董事会中设置审计委员会的，董事会对下列事项作出决议前应当经审计委员会全体成员过半数通过：

- （一）聘用、解聘承办公司审计业务的会计师事务所；
- （二）聘任、解聘财务负责人；
- （三）披露财务会计报告；

（四）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其他事项。

第一百三十八条 上市公司设董事会秘书，负责公司股东会和董事会会议的筹备、文件保管以及公司股东资料的管理，办理信息披露事务等事宜。

第一百三十九条 上市公司董事与董事会会议决议事项所涉及的企业或者个人有关联关系的，该董事应当及时向董事会书面报告。有关联关系的董事不得对该项决议行使表决权，也不得代理其他董事行使表决权。该董事会会议由过半数的无关联关系董事出席即可举行，董事会会议所作决议须经无关联关系董事过半数通过。出席董事会会议的无关联关系董事人数不足三人的，应当将该事项提交上市公司股东会审议。

第一百四十条 上市公司应当依法披露股东、实际控制人的信息，相关信息应当真实、准确、完整。

禁止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代持上市公司股票。

第一百四十一条 上市公司控股子公司不得取得该上市公司的股份。

上市公司控股子公司因公司合并、质权行使等原因持有上市公司股份的，不得行使所持股份对应的表决权，并应当及时处分相关上市公司股份。

第六章 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发行和转让

第一节 股份发行

第一百四十二条 公司的资本划分为股份。公司的全部股份，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择一采用面额股或者无面额股。采用面额股的，每一股的金额相等。

公司可以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将已发行的面额股全部转换为无面额股或者将无面额股全部转换为面额股。

采用无面额股的，应当将发行股份所得股款的二分之一以上计入注册资本。

第一百四十三条 股份的发行，实行公平、公正的原则，同类别的每一股份应当具有同等权利。

同次发行的同类别股份，每股的发行条件和价格应当相同；认购人所认购的股份，每股应当支付相同价额。

第一百四十四条 公司可以按照公司章程的规定发行下列与普通股权利不同的类别股：

（一）优先或者劣后分配利润或者剩余财产的股份；

（二）每一股的表决权数多于或者少于普通股的股份；

（三）转让须经公司同意等转让受限的股份；

（四）国务院规定的其他类别股。

公开发行股份的公司不得发行前款第二项、第三项规定的类别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的除外。

公司发行本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的类别股的，对于监事或者审计委员会成员的选举和更换，类别股与普通股每一股的表决权数相同。

第一百四十五条 发行类别股的公司，应当在公司章程中载明以下事项：

（一）类别股分配利润或者剩余财产的顺序；

（二）类别股的表决权数；

（三）类别股的转让限制；

（四）保护中小股东权益的措施；

（五）股东会认为需要规定的其他事项。

第一百四十六条 发行类别股的公司，有本法第一百一十六条第三款规定的事项等可能影响类别股股东权利的，除应当依照第一百一十六条第三款的规定经股东会决议外，还应当经出席类别股股东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公司章程可以对需经类别股股东会议决议的其他事项作出规定。

第一百四十七条 公司的股份采取股票的形式。股票是公司签发的证明股东所持股份的凭证。

公司发行的股票，应当为记名股票。

第一百四十八条 面额股股票的发行价格可以按票面金额，也可以超过票面金额，但不得低于票面金额。

第一百四十九条 股票采用纸面形式或者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其他形式。

股票采用纸面形式的，应当载明下列主要事项：

（一）公司名称；

(二) 公司成立日期或者股票发行的时间;

(三) 股票种类、票面金额及代表的股份数, 发行无面额股的, 股票代表的股份数。

股票采用纸面形式的, 还应当载明股票的编号, 由法定代表人签名, 公司盖章。

发起人股票采用纸面形式的, 应当标明发起人股票字样。

第一百五十条 股份有限公司成立后, 即向股东正式交付股票。公司成立前不得向股东交付股票。

第一百五十一条 公司发行新股, 股东会应当对下列事项作出决议:

(一) 新股种类及数额;

(二) 新股发行价格;

(三) 新股发行的起止日期;

(四) 向原有股东发行新股的种类及数额;

(五) 发行无面额股的, 新股发行所得股款计入注册资本的金额。

公司发行新股, 可以根据公司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 确定其作价方案。

第一百五十二条 公司章程或者股东会可以授权董事会在三年内决定发行不超过已发行股份百分之五十的股份。但以非货币财产作价出资的应当经股东会决议。

董事会依照前款规定决定发行股份导致公司注册资本、已发行股份数发生变化的, 对公司章程该项记载事项的修改不需再由股东会表决。

第一百五十三条 公司章程或者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决定发行新股的, 董事会决议应当经全体董事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第一百五十四条 公司向社会公开募集股份, 应当经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注册, 公告招股说明书。

招股说明书应当附有公司章程, 并载明下列事项:

(一) 发行的股份总数;

(二) 面额股的票面金额和发行价格或者无面额股的发行价格;

(三) 募集资金的用途;

(四) 认股人的权利和义务;

(五) 股份种类及其权利和义务;

（六）本次募股的起止日期及逾
期未募足时认股人可以撤回所认股份
的说明。

公司设立时发行股份的，还应当
载明发起人认购的股份数。

第一百五十五条 公司向社会公
开募集股份，应当由依法设立的证券
公司承销，签订承销协议。

第一百五十六条 公司向社会公
开募集股份，应当同银行签订代收股
款协议。

代收股款的银行应当按照协议代
收和保存股款，向缴纳股款的认股人
出具收款单据，并负有向有关部门出
具收款证明的义务。

公司发行股份募足股款后，应予
公告。

第二节 股份转让

第一百五十七条 股份有限公司
的股东持有的股份可以向其他股东转
让，也可以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公
司章程对股份转让有限制的，其转让
按照公司章程的规定进行。

第一百五十八条 股东转让其股
份，应当在依法设立的证券交易场所

进行或者按照国务院规定的其他方式
进行。

第一百五十九条 股票的转让，由
股东以背书方式或者法律、行政法规
规定的其他方式进行；转让后由公司
将受让人的姓名或者名称及住所记载
于股东名册。

股东会会议召开前二十日内或者
公司决定分配股利的基准日前五日内，
不得变更股东名册。法律、行政法规或
者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对上市公
司股东名册变更另有规定的，从其规
定。

第一百六十条 公司公开发行股
份前已发行的股份，自公司股票在证
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一年内不得
转让。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证
券监督管理机构对上市公司的股东、实
际控制人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
当向公司申报所持有的本公司的股份
及其变动情况，在就任时确定的任职
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
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
所持本公司股份自公司股票上市交易
之日起一年内不得转让。上述人员离

职后半年内，不得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公司章程可以对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作出其他限制性规定。

股份在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限制转让期限内出质的，质权人不得在限制转让期限内行使质权。

第一百六十一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对股东会该项决议投反对票的股东可以请求公司按照合理的价格收购其股份，公开发行股份的公司除外：

（一）公司连续五年不向股东分配利润，而公司该五年连续盈利，并且符合本法规定的分配利润条件；

（二）公司转让主要财产；

（三）公司章程规定的营业期限届满或者章程规定的其他解散事由出现，股东会通过决议修改章程使公司存续。

自股东会决议作出之日起六十日内，股东与公司不能达成股份收购协议的，股东可以自股东会决议作出之日起九十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公司因本条第一款规定的情形收购的本公司股份，应当在六个月内依法转让或者注销。

第一百六十二条 公司不得收购本公司股份。但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

（一）减少公司注册资本；

（二）与持有本公司股份的其他公司合并；

（三）将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者股权激励；

（四）股东因对股东会作出的公司合并、分立决议持异议，要求公司收购其股份；

（五）将股份用于转换公司发行的可转换为股票的公司债券；

（六）上市公司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所必需。

公司因前款第一项、第二项规定的情形收购本公司股份的，应当经股东会决议；公司因前款第三项、第五项、第六项规定的情形收购本公司股份的，可以按照公司章程或者股东会的授权，经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出席的董事会会议决议。

公司依照本条第一款规定收购本公司股份后，属于第一项情形的，应当自收购之日起十日内注销；属于第二项、第四项情形的，应当在六个月内转

让或者注销；属于第三项、第五项、第六项情形的，公司合计持有的本公司股份数不得超过本公司已发行股份总数的百分之十，并应当在三年内转让或者注销。

上市公司收购本公司股份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的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上市公司因本条第一款第三项、第五项、第六项规定的情形收购本公司股份的，应当通过公开的集中交易方式进行。

公司不得接受本公司的股份作为质权的标的。

第一百六十三条 公司不得为他人取得本公司或者其母公司的股份提供赠与、借款、担保以及其他财务资助，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的除外。

为公司利益，经股东会决议，或者董事会按照公司章程或者股东会的授权作出决议，公司可以为他人取得本公司或者其母公司的股份提供财务资助，但财务资助的累计总额不得超过已发行股本总额的百分之十。董事会作出决议应当经全体董事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违反前两款规定，给公司造成损失的，负有责任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第一百六十四条 股票被盗、遗失或者灭失，股东可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公示催告程序，请求人民法院宣告该股票失效。人民法院宣告该股票失效后，股东可以向公司申请补发股票。

第一百六十五条 上市公司的股票，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及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上市交易。

第一百六十六条 上市公司应当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披露相关信息。

第一百六十七条 自然人股东死亡后，其合法继承人可以继承股东资格；但是，股份转让受限的股份有限公司的章程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七章 国家出资公司组织机构的特别规定

第一百六十八条 国家出资公司的组织机构，适用本章规定；本章没有规定的，适用本法其他规定。

本法所称国家出资公司，是指国家出资的国有独资公司、国有资本控

股公司，包括国家出资的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百六十九条 国家出资公司，由国务院或者地方人民政府分别代表国家依法履行出资人职责，享有出资人权益。国务院或者地方人民政府可以授权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或者其他部门、机构代表本级人民政府对国家出资公司履行出资人职责。

代表本级人民政府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部门，以下统称为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

第一百七十条 国家出资公司中中国共产党的组织，按照中国共产党章程的规定发挥领导作用，研究讨论公司重大经营管理事项，支持公司的组织机构依法行使职权。

第一百七十一条 国有独资公司章程由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制定。

第一百七十二条 国有独资公司不设股东会，由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行使股东会职权。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可以授权公司董事会行使股东会的部分职权，但公司章程的制定和修改，公司的合并、分立、解散、申请破产，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分配利

润，应当由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决定。

第一百七十三条 国有独资公司的董事会依照本法规定行使职权。

国有独资公司的董事会成员中，应当过半数为外部董事，并应当有公司职工代表。

董事会成员由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委派；但是，董事会成员中的职工代表由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

董事会设董事长一人，可以设副董事长。董事长、副董事长由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从董事会成员中指定。

第一百七十四条 国有独资公司的经理由董事会聘任或者解聘。

经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同意，董事会成员可以兼任经理。

第一百七十五条 国有独资公司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未经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同意，不得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或者其他经济组织兼职。

第一百七十六条 国有独资公司在董事会中设置由董事组成的审计委员会行使本法规定的监事会职权的，不设监事会或者监事。

第一百七十七条 国家出资公司应当依法建立健全内部监督管理和风险控制制度，加强内部合规管理。

第八章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资格和义务

第一百七十八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担任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一）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

（二）因贪污、贿赂、侵占财产、挪用财产或者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被判处刑罚，或者因犯罪被剥夺政治权利，执行期满未逾五年，被宣告缓刑的，自缓刑考验期满之日起未逾二年；

（三）担任破产清算的公司、企业的董事或者厂长、经理，对该公司、企业的破产负有个人责任的，自该公司、企业破产清算完结之日起未逾三年；

（四）担任因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关闭的公司、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并负有个人责任的，自该公司、企业被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关闭之日起未逾三年；

（五）个人因所负数额较大债务到期未清偿被人民法院列为失信被执行人。

违反前款规定选举、委派董事、监事或者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该选举、委派或者聘任无效。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任职期间出现本条第一款所列情形的，公司应当解除其职务。

第一百七十九条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

第一百八十条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对公司负有忠实义务，应当采取措施避免自身利益与公司利益冲突，不得利用职权牟取不正当利益。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对公司负有勤勉义务，执行职务应当为公司的最大利益尽到管理者通常应有的合理注意。

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担任公司董事但实际执行公司事务的，适用前两款规定。

第一百八十一条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侵占公司财产、挪用公司资金；

（二）将公司资金以其个人名义或者以其他个人名义开立账户存储；

（三）利用职权贿赂或者收受其他非法收入；

（四）接受他人与公司交易的佣金归为己有；

（五）擅自披露公司秘密；

（六）违反对公司忠实义务的其他行为。

第一百八十二条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直接或者间接与本公司订立合同或者进行交易，应当就与订立合同或者进行交易有关的事项向董事会或者股东会报告，并按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经董事会或者股东会决议通过。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近亲属，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其近亲属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企业，以及与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有其他关联关系的关联人，与公司订立合同或者进行交易，适用前款规定。

第一百八十三条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利用职务便利为自

己或者他人谋取属于公司的商业机会。但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

（一）向董事会或者股东会报告，并按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经董事会或者股东会决议通过；

（二）根据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不能利用该商业机会。

第一百八十四条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未向董事会或者股东会报告，并按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经董事会或者股东会决议通过，不得自营或者为他人经营与其任职公司同类的业务。

第一百八十五条 董事会对本法第一百八十二条至第一百八十四条规定的事项决议时，关联董事不得参与表决，其表决权不计入表决权总数。出席董事会会议的无关联关系董事人数不足三人的，应当将该事项提交股东会审议。

第一百八十六条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违反本法第一百八十一条至第一百八十四条规定所得的收入应当归公司所有。

第一百八十七条 股东会要求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的，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列席并接受股东的质询。

第一百八十八条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执行职务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给公司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第一百八十九条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有前条规定的情形的，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一百八十日以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百分之十以上股份的股东，可以书面请求监事会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监事有前条规定的情形的，前述股东可以书面请求董事会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监事会或者董事会收到前款规定的股东书面请求后拒绝提起诉讼，或者自收到请求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提起诉讼，或者情况紧急、不立即提起诉讼将会使公司利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前款规定的股东有权为公司利益以自己的名义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他人侵犯公司合法权益，给公司造成损失的，本条第一款规定的股东可以依照前两款的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公司全资子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有前条规定情形，或者他人侵犯公司全资子公司合法权益造成损失的，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一百八十日以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百分之十以上股份的股东，可以依照前三款规定书面请求全资子公司的监事会、董事会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或者以自己的名义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一百九十条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损害股东利益的，股东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一百九十一条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执行职务，给他人造成损害的，公司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也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第一百九十二条 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指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从事损害公司或者股东利益的行为的，与该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承担连带责任。

第一百九十三条 公司可以在董事任职期间为董事因执行公司职务承担的赔偿责任投保责任保险。

公司为董事投保责任保险或者续保后，董事会应当向股东会报告责任保险的投保金额、承保范围及保险费率等内容。

第九章 公司债券

第一百九十四条 本法所称公司债券，是指公司发行的约定按期还本付息的有价证券。

公司债券可以公开发行，也可以非公开发行。

公司债券的发行和交易应当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

第一百九十五条 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应当经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注册，公告公司债券募集办法。

公司债券募集办法应当载明下列主要事项：

- （一）公司名称；
- （二）债券募集资金的用途；
- （三）债券总额和债券的票面金额；
- （四）债券利率的确定方式；
- （五）还本付息的期限和方式；
- （六）债券担保情况；

（七）债券的发行价格、发行的起止日期；

（八）公司净资产额；

（九）已发行的尚未到期的公司债券总额；

（十）公司债券的承销机构。

第一百九十六条 公司以纸面形式发行公司债券的，应当在债券上载明公司名称、债券票面金额、利率、偿还期限等事项，并由法定代表人签名，公司盖章。

第一百九十七条 公司债券应当为记名债券。

第一百九十八条 公司发行公司债券应当置备公司债券持有人名册。

发行公司债券的，应当在公司债券持有人名册上载明下列事项：

- （一）债券持有人的姓名或者名称及住所；
- （二）债券持有人取得债券的日期及债券的编号；
- （三）债券总额，债券的票面金额、利率、还本付息的期限和方式；
- （四）债券的发行日期。

第一百九十九条 公司债券的登记结算机构应当建立债券登记、存管、付息、兑付等相关制度。

第二百条 公司债券可以转让，转让价格由转让人与受让人约定。

公司债券的转让应当符合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

第二百零一条 公司债券由债券持有人以背书方式或者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方式转让；转让后由公司将受让人的姓名或者名称及住所记载于公司债券持有人名册。

第二百零二条 股份有限公司经股东会决议，或者经公司章程、股东会授权由董事会决议，可以发行可转换为股票的公司债券，并规定具体的转换办法。上市公司发行可转换为股票的公司债券，应当经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注册。

发行可转换为股票的公司债券，应当在债券上标明可转换公司债券字样，并在公司债券持有人名册上载明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数额。

第二百零三条 发行可转换为股票的公司债券的，公司应当按照其转换办法向债券持有人换发股票，但债券持有人对转换股票或者不转换股票

有选择权。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二百零四条 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应当为同期债券持有人设立债券持有人会议，并在债券募集办法中对债券持有人会议的召集程序、会议规则和其他重要事项作出规定。债券持有人会议可以对与债券持有人有利害关系的事项作出决议。

除公司债券募集办法另有约定外，债券持有人会议决议对同期全体债券持有人发生效力。

第二百零五条 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发行人应当为债券持有人聘请债券受托管理人，由其为债券持有人办理受领清偿、债权保全、与债券相关的诉讼以及参与债务人破产程序等事项。

第二百零六条 债券受托管理人应当勤勉尽责，公正履行受托管理职责，不得损害债券持有人利益。

受托管理人与债券持有人存在利益冲突可能损害债券持有人利益的，债券持有人会议可以决议变更债券受托管理人。

债券受托管理人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债券持有人会议决议，损害

债券持有人利益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第十章 公司财务、会计

第二百零七条 公司应当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财政部门的规定建立本公司的财务、会计制度。

第二百零八条 公司应当在每一会计年度终了时编制财务会计报告，并依法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财务会计报告应当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财政部门的规定制作。

第二百零九条 有限责任公司应当按照公司章程规定的期限将财务会计报告送交各股东。

股份有限公司的财务会计报告应当在召开股东会年会的二十日前置备于本公司，供股东查阅；公开发行股份的股份有限公司应当公告其财务会计报告。

第二百一十条 公司分配当年税后利润时，应当提取利润的百分之十列入公司法定公积金。公司法定公积金累计额为公司注册资本的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可以不再提取。

公司的法定公积金不足以弥补以前年度亏损的，在依照前款规定提取

法定公积金之前，应当先用当年利润弥补亏损。

公司从税后利润中提取法定公积金后，经股东会决议，还可以从税后利润中提取任意公积金。

公司弥补亏损和提取公积金后所余税后利润，有限责任公司按照股东实缴的出资比例分配利润，全体股东约定不按照出资比例分配利润的除外；股份有限公司按照股东所持有的股份比例分配利润，公司章程另有规定的除外。

公司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不得分配利润。

第二百一十一条 公司违反本法规定向股东分配利润的，股东应当将违反规定分配的利润退还公司；给公司造成损失的，股东及负有责任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第二百一十二条 股东会作出分配利润的决议的，董事会应当在股东会决议作出之日起六个月内进行分配。

第二百一十三条 公司以超过股票票面金额的发行价格发行股份所得的溢价款、发行无面额股所得股款未计入注册资本的金额以及国务院财政

部门规定列入资本公积金的其他项目，应当列为公司资本公积金。

第二百一十四条 公司的公积金用于弥补公司的亏损、扩大公司生产经营或者转为增加公司注册资本。

公积金弥补公司亏损，应当先使用任意公积金和法定公积金；仍不能弥补的，可以按照规定使用资本公积金。

法定公积金转为增加注册资本时，所留存的该项公积金不得少于转增前公司注册资本的百分之二十五。

第二百一十五条 公司聘用、解聘承办公司审计业务的会计师事务所，按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股东会、董事会或者监事会决定。

公司股东会、董事会或者监事会就解聘会计师事务所进行表决时，应当允许会计师事务所陈述意见。

第二百一十六条 公司应当向聘用的会计师事务所提供真实、完整的会计凭证、会计账簿、财务会计报告及其他会计资料，不得拒绝、隐匿、谎报。

第二百一十七条 公司除法定的会计账簿外，不得另立会计账簿。

对公司资金，不得以任何个人名义开立账户存储。

第十一章 公司合并、分立、增资、减资

第二百一十八条 公司合并可以采取吸收合并或者新设合并。

一个公司吸收其他公司为吸收合并，被吸收的公司解散。两个以上公司合并设立一个新的公司为新设合并，合并各方解散。

第二百一十九条 公司与其持股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公司合并，被合并的公司不需经股东会决议，但应当通知其他股东，其他股东有权请求公司按照合理的价格收购其股权或者股份。

公司合并支付的价款不超过本公司净资产百分之十的，可以不经股东会决议；但是，公司章程另有规定的除外。

公司依照前两款规定合并不经股东会决议的，应当经董事会决议。

第二百二十条 公司合并，应当由合并各方签订合并协议，并编制资产负债表及财产清单。公司应当自作出合并决议之日起十日内通知债权人，并于三十日内在报纸上或者国家企业

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告。债权人自接到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接到通知的自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可以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

第二百二十一条 公司合并时，合并各方的债权、债务，应当由合并后存续的公司或者新设的公司承继。

第二百二十二条 公司分立，其财产作相应的分割。

公司分立，应当编制资产负债表及财产清单。公司应当自作出分立决议之日起十日内通知债权人，并于三十日内在报纸上或者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告。

第二百二十三条 公司分立前的债务由分立后的公司承担连带责任。但是，公司在分立前与债权人就债务清偿达成的书面协议另有约定的除外。

第二百二十四条 公司减少注册资本，应当编制资产负债表及财产清单。

公司应当自股东会作出减少注册资本决议之日起十日内通知债权人，并于三十日内在报纸上或者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告。债权人自接到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接到通知

的自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有权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

公司减少注册资本，应当按照股东出资或者持有股份的比例相应减少出资额或者股份，法律另有规定、有限责任公司全体股东另有约定或者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二百二十五条 公司依照本法第二百一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弥补亏损后，仍有亏损的，可以减少注册资本弥补亏损。减少注册资本弥补亏损的，公司不得向股东分配，也不得免除股东缴纳出资或者股款的义务。

依照前款规定减少注册资本的，不适用前条第二款的规定，但应当自股东会作出减少注册资本决议之日起三十日内在报纸上或者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告。

公司依照前两款的规定减少注册资本后，在法定公积金和任意公积金累计额达到公司注册资本百分之五十前，不得分配利润。

第二百二十六条 违反本法规定减少注册资本的，股东应当退还其收到的资金，减免股东出资的应当恢复原状；给公司造成损失的，股东及负有

责任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第二百二十七条 有限责任公司增加注册资本时，股东在同等条件下有权优先按照实缴的出资比例认缴出资。但是，全体股东约定不按照出资比例优先认缴出资的除外。

股份有限公司为增加注册资本发行新股时，股东不享有优先认购权，公司章程另有规定或者股东会决议决定股东享有优先认购权的除外。

第二百二十八条 有限责任公司增加注册资本时，股东认缴新增资本的出资，依照本法设立有限责任公司缴纳出资的有关规定执行。

股份有限公司为增加注册资本发行新股时，股东认购新股，依照本法设立股份有限公司缴纳股款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二章 公司解散和清算

第二百二十九条 公司因下列原因解散：

（一）公司章程规定的营业期限届满或者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解散事由出现；

（二）股东会决议解散；

（三）因公司合并或者分立需要解散；

（四）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关闭或者被撤销；

（五）人民法院依照本法第二百三十一条的规定予以解散。

公司出现前款规定的解散事由，应当在十日内将解散事由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予以公示。

第二百三十条 公司有前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项情形，且尚未向股东分配财产的，可以通过修改公司章程或者经股东会决议而存续。

依照前款规定修改公司章程或者经股东会决议，有限责任公司须经持有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股份有限公司须经出席股东会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第二百三十一条 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的，持有公司百分之十以上表决权的股东，可以请求人民法院解散公司。

第二百三十二条 公司因本法第二百二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项、

第四项、第五项规定而解散的，应当清算。董事为公司清算义务人，应当在解散事由出现之日起十五日内组成清算组进行清算。

清算组由董事组成，但是公司章程另有规定或者股东会决议另选他人的除外。

清算义务人未及时履行清算义务，给公司或者债权人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第二百三十三条 公司依照前条第一款的规定应当清算，逾期不成立清算组进行清算或者成立清算组后不清算的，利害关系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指定有关人员组成清算组进行清算。人民法院应当受理该申请，并及时组织清算组进行清算。

公司因本法第二百二十九条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定而解散的，作出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关闭或者撤销决定的部门或者公司登记机关，可以申请人民法院指定有关人员组成清算组进行清算。

第二百三十四条 清算组在清算期间行使下列职权：

（一）清理公司财产，分别编制资产负债表和财产清单；

（二）通知、公告债权人；

（三）处理与清算有关的公司未了结的业务；

（四）清缴所欠税款以及清算过程中产生的税款；

（五）清理债权、债务；

（六）分配公司清偿债务后的剩余财产；

（七）代表公司参与民事诉讼活动。

第二百三十五条 清算组应当自成立之日起十日内通知债权人，并于六十日内在报纸上或者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告。债权人应当自接到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接到通知的自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向清算组申报其债权。

债权人申报债权，应当说明债权的有关事项，并提供证明材料。清算组应当对债权进行登记。

在申报债权期间，清算组不得对债权人进行清偿。

第二百三十六条 清算组在清理公司财产、编制资产负债表和财产清单后，应当制订清算方案，并报股东会或者人民法院确认。

公司财产在分别支付清算费用、职工的工资、社会保险费用和法定补偿金，缴纳所欠税款，清偿公司债务后的剩余财产，有限责任公司按照股东的出资比例分配，股份有限公司按照股东持有的股份比例分配。

清算期间，公司存续，但不得开展与清算无关的经营活动。公司财产在未依照前款规定清偿前，不得分配给股东。

第二百三十七条 清算组在清理公司财产、编制资产负债表和财产清单后，发现公司财产不足清偿债务的，应当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破产清算。

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清算组应当将清算事务移交给人民法院指定的破产管理人。

第二百三十八条 清算组成员履行清算职责，负有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

清算组成员怠于履行清算职责，给公司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给债权人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第二百三十九条 公司清算结束后，清算组应当制作清算报告，报股东

会或者人民法院确认，并报送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公司登记。

第二百四十条 公司在存续期间未产生债务，或者已清偿全部债务的，经全体股东承诺，可以按照规定通过简易程序注销公司登记。

通过简易程序注销公司登记，应当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予以公告，公告期限不少于二十日。公告期限届满后，未有异议的，公司可以在二十日内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公司登记。

公司通过简易程序注销公司登记，股东对本条第一款规定的内容承诺不实的，应当对注销登记前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第二百四十一条 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关闭或者被撤销，满三年未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公司登记的，公司登记机关可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予以公告，公告期限不少于六十日。公告期限届满后，未有异议的，公司登记机关可以注销公司登记。

依照前款规定注销公司登记的，原公司股东、清算义务人的责任不受影响。

第二百四十二条 公司被依法宣告破产的，依照有关企业破产的法律实施破产清算。

第十三章 外国公司的分支机构

第二百四十三条 本法所称外国公司，是指依照外国法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设立的公司。

第二百四十四条 外国公司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设立分支机构，应当向中国主管机关提出申请，并提交其公司章程、所属国的公司登记证书等有关文件，经批准后，向公司登记机关依法办理登记，领取营业执照。

外国公司分支机构的审批办法由国务院另行规定。

第二百四十五条 外国公司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设立分支机构，应当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指定负责该分支机构的代表人或者代理人，并向该分支机构拨付与其所从事的经营活动相适应的资金。

对外国公司分支机构的经营资金需要规定最低限额的，由国务院另行规定。

第二百四十六条 外国公司的分支机构应当在其名称中标明该外国公司的国籍及责任形式。

外国公司的分支机构应当在本机构中置备该外国公司章程。

第二百四十七条 外国公司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设立的分支机构不具有中国法人资格。

外国公司对其分支机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进行经营活动承担民事责任。

第二百四十八条 经批准设立的外国公司分支机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业务活动，应当遵守中国的法律，不得损害中国的社会公共利益，其合法权益受中国法律保护。

第二百四十九条 外国公司撤销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分支机构时，应当依法清偿债务，依照本法有关公司清算程序的规定进行清算。未清偿债务之前，不得将其分支机构的财产转移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

第十四章 法律责任

第二百五十条 违反本法规定，虚报注册资本、提交虚假材料或者采取其他欺诈手段隐瞒重要事实取得公司登记的，由公司登记机关责令改正，对虚报注册资本的公司，处以虚报注册资本金额百分之五以上百分之十五以下的罚款；对提交虚假材料或者采取其他欺诈手段隐瞒重要事实的公司，

处以五万元以上二百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营业执照；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以三万元以上三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二百五十一条 公司未依照本法第四十条规定公示有关信息或者不如实公示有关信息的，由公司登记机关责令改正，可以处以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以五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以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二百五十二条 公司的发起人、股东虚假出资，未交付或者未按期交付作为出资的货币或者非货币财产的，由公司登记机关责令改正，可以处以五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以虚假出资或者未出资金额百分之五以上百分之十五以下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以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二百五十三条 公司的发起人、股东在公司成立后，抽逃其出资的，由公司登记机关责令改正，处以所抽逃出资金额百分之五以上百分之十五以下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

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以三万元以上三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二百五十四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财政部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等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处罚：

（一）在法定的会计账簿以外另立会计账簿；

（二）提供存在虚假记载或者隐瞒重要事实的财务会计报告。

第二百五十五条 公司在合并、分立、减少注册资本或者进行清算时，不依照本法规定通知或者公告债权人的，由公司登记机关责令改正，对公司处以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二百五十六条 公司在进行清算时，隐匿财产，对资产负债表或者财产清单作虚假记载，或者在未清偿债务前分配公司财产的，由公司登记机关责令改正，对公司处以隐匿财产或者未清偿债务前分配公司财产金额百分之五以上百分之十以下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以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二百五十七条 承担资产评估、验资或者验证的机构提供虚假材料或

者提供有重大遗漏的报告，由有关部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等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处罚。

承担资产评估、验资或者验证的机构因其出具的评估结果、验资或者验证证明不实，给公司债权人造成损失的，除能够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外，在其评估或者证明不实的金额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

第二百五十八条 公司登记机关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未履行职责或者履行职责不当的，对负有责任的领导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政务处分。

第二百五十九条 未依法登记为有限责任公司或者股份有限公司，而冒用有限责任公司或者股份有限公司名义的，或者未依法登记为有限责任公司或者股份有限公司的分公司，而冒用有限责任公司或者股份有限公司的分公司名义的，由公司登记机关责令改正或者予以取缔，可以并处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二百六十条 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公

司登记机关可以吊销营业执照，但公司依法办理歇业的除外。

公司登记事项发生变更时，未依照本法规定办理有关变更登记的，由公司登记机关责令限期登记；逾期不登记的，处以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二百六十一条 外国公司违反本法规定，擅自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设立分支机构的，由公司登记机关责令改正或者关闭，可以并处五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二百六十二条 利用公司名义从事危害国家安全、社会公共利益的严重违法行为的，吊销营业执照。

第二百六十三条 公司违反本法规定，应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和缴纳罚款、罚金的，其财产不足以支付时，先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第二百六十四条 违反本法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五章 附则

第二百六十五条 本法下列用语的含义：

（一）高级管理人员，是指公司的经理、副经理、财务负责人，上市公司

董事会秘书和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人员。

(二) 控股股东,是指其出资额占有限责任公司资本总额超过百分之五十或者其持有的股份占股份有限公司股本总额超过百分之五十的股东;出资额或者持有股份的比例虽然低于百分之五十,但依其出资额或者持有的股份所享有的表决权已足以对股东会的决议产生重大影响的股东。

(三) 实际控制人,是指通过投资关系、协议或者其他安排,能够实际支配公司行为的人。

(四) 关联关系,是指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其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企业之间的关系,以及可能导致公司利益转移的其他关系。但是,国家控股的企业之间不仅因为同受国家控股而具有关联关系。

第二百六十六条 本法自 2024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

本法施行前已登记设立的公司,出资期限超过本法规定的期限的,除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另有规定外,应当逐步调整至本法规定的期限以内;对于出资期限、出资额明显异常

的,公司登记机关可以依法要求其及时调整。具体实施办法由国务院规定。

二、观点速递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惩治伪造公司、企业印章等破坏 营商环境犯罪典型案例

——摘自微信《最高人民检察院》

案例一

姜某帅等伪造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伪造公司、事业单位印章,伪造身份证件,伪造武装部队印章案

【基本案情】

2019 年至 2023 年 3 月间,姜某帅根据他人提供的信息,采用自行制作的方式,为朱某升、付某民、王某华等人伪造国家机关证件 80 个、国家机关公文 2 件、国家机关印章 48 枚、公司印章 399 枚、事业单位印章 4 枚、居民身份证 25 个、武装部队印章 2 枚,非法获利 9.2 万余元。

其中，2022 年 10 月至 2023 年 2 月间，姜某帅根据朱某升提供的信息，为其伪造国家机关印章 2 枚、公司印章 1 枚。后朱某升将伪造的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行人力资源部印章加盖在虚构的上下游购销合同上，帮助其客户从某银行贷款 400 余万元。

2022 年 11 月，姜某帅根据付某民提供的信息，为其伪造国家机关证件 1 个、身份证件 2 个、公司印章 1 枚。后付某民将伪造的北京公共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第一客运分公司印章加盖在工资证明上，从银行成功办理个人信用贷款 30 万元。

2022 年 8 月至 2023 年 1 月间，姜某帅根据王某华提供的信息，为其伪造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行政公寓房产证 24 个、北京金昊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印章 1 枚及其他公司印章 1 枚。王某华将伪造的上述公司印章加盖在伪造的房屋买卖合同上，并编造上述金融大街行政公寓已转让给王某华所在公司的事实，虚构经济实力，获得其商业伙伴巨额投资。

【处理结果】

2023 年 7 月 5 日至 14 日，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以姜某帅、朱某升、付某民、王某华涉嫌伪造、买卖国家机关证件罪，伪造公司、企业印章罪等罪名分别移送起诉。2023 年 7 月 28 日至 11 月 8 日，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以伪造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罪，伪造公司、事业单位印章罪，伪造身份证件罪，伪造武装部队印章罪对姜某帅提起公诉；以伪造国家机关证件罪、伪造公司印章罪对王某华提起公诉；以伪造国家机关印章罪、伪造公司印章罪对朱某升提起公诉；以伪造国家机关证件罪、伪造公司印章罪、伪造身份证件罪对付某民提起公诉。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分别于 2023 年 8 月 11 日以伪造国家机关证件罪、伪造公司印章罪数罪并罚判处被告人王某华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五千元。2023 年 9 月 27 日以伪造国家机关印章罪、伪造公司印章罪数罪并罚判处被告人朱某升有期徒刑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千元。2023 年 10 月 11 日以伪造国家机关证件罪、伪造公司印章罪、伪造身份证件罪数罪并罚判处被告人付某民拘役五个月，

缓刑十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千元。2023年11月22日以伪造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罪，伪造公司、事业单位印章罪，伪造身份证件罪，伪造武装部队印章罪数罪并罚判处被告人姜某帅有期徒刑九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九万元。一审宣判后，各被告人未上诉，判决已生效。

案例二

孔某非合同诈骗案

【基本案情】

2022年12月12日，孔某非冒用中北电力（内蒙古）有限公司名义与某信息有限公司签订产品购销合同购买电子产品，并通过P图方式在购销合同及验收单上加盖其自行伪造的中北电力（内蒙古）有限公司的公章，骗取该公司按合同约定交付的价值101万余元电子产品。2023年1月12日至31日，孔某非又冒用国网内蒙古东部电力有限公司、内蒙古电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名义，以同样方式与被害单位签订购买电子产品购销合同并加盖伪造公司公章，骗取价值120万余元电子产品。

孔某非收到上述电子产品后未支付货款，经被害单位多次催要支付部分货款，实际骗得财物价值159万余元。

【处理结果】

2023年5月15日，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公安局赛罕区分局以孔某非涉嫌合同诈骗罪移送起诉。同年6月15日，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人民检察院以合同诈骗罪对孔某非提起公诉。同年8月12日，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人民法院以合同诈骗罪判处被告人孔某非有期徒刑十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一审宣判后，被告人未上诉，判决已生效。

案例三

罗某诈骗案

【基本案情】

2022年7月，罗某谎称认识广东省阳春市八甲镇南方电网抽水蓄能项目工程工作人员，可以介绍被害人周某孔为该项目提供柴油。为获取被害人信任，罗某假冒南方电网抽水蓄能工程项目人员与被害人

在网络上联系，同时物色他人冒充项目经理、财务，并伪造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印章与周某孔签订供油协议。期间，罗某以推进协议落实需要宴请、打点项目工作人员为由陆续骗取周某孔 23 万余元及手机一部（价值 8000 余元）。

【处理结果】

2023 年 3 月 17 日，广东省广州市公安局增城区分局以罗某涉嫌诈骗罪、盗窃罪移送起诉。同年 4 月 19 日，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检察院以诈骗罪对罗某提起公诉。同年 6 月 27 日，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以诈骗罪判处被告人罗某有期徒刑三年二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一审宣判后，被告人未上诉，判决已生效。

案例四

王某业等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洗钱案

【基本案情】

王某业、王某经他人介绍认识后协商合作融资，约定由王某负责贸易业务端，王某业负责寻找担保、

融资备案等。2021 年 3 月至 7 月，王某业、王某等未经有关部门批准，以王某业实际控制的广州稼盛商贸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稼盛公司）为融资主体，公开虚假宣称该公司是中国储备粮管理集团全资控股的四级子公司，谎称该公司对外有数千万的应收优质债权，并以王某业实际控制的中民百业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民公司）、稼盛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稼盛公司）负责提供担保，对外亦谎称该两家公司系中储粮集团二级、三级子公司。王某业、王某等通过吉安中传金融资产服务中心有限公司、广西中安资产登记服务有限公司违规备案登记，将融资产品包装成《中储应收账款融资计划资产收益权产品》，以 7.6%—8.8% 不等的年收益率为诱饵吸引不特定公众投资，非法吸收资金共计 4500 万余元，主要用于支付融资居间费、备案费、公司经营及王某个人贸易业务。在此期间，王某业指派王某斌任财务总监，负责融资款管理、审批；指使晏某负责相关融资产品的违规备案。

2021 年 9 月，王某业为防止部分融资款被冻结，指示王某斌将

1030 万元融资款进行拆分，从广州稼盛公司账户转出，先后经上海稼盛公司、中民公司等公司账户，最终于 2022 年 1 月底分多笔汇入王某业实际控制的上海与祥实业有限公司账户。

【处理结果】

2022 年 9 月 9 日，广东省广州市公安局南沙区分局以王某业、王某等人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移送起诉。同月 15 日，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检察院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洗钱罪对王某业、王某斌提起公诉，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对王某、晏某提起公诉。同年 12 月 14 日，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法院对被告人王某业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洗钱罪数罪并罚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十五万元；对被告人王某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四十万元；对被告人王某斌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洗钱罪数罪并罚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十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六万元；对被告人晏某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缓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一审宣

判后，部分被告人上诉。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综合考量二审期间退赃退赔、全额挽损情节酌情从轻处罚，2023 年 6 月 12 日，二审判决改判被告人王某业有期徒刑五年九个月、被告人王某有期徒刑四年，其余部分维持原判。

案例五

孙某良集资诈骗案

【基本案情】

2020 年 7 月开始，孙某良负责管理成都兵哥梦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兵哥梦公司），并于 2020 年 8 月以 6000 元价格收购该公司，成为公司法定代表人，并将公司注册资本变更为认缴 1.8 亿元。2020 年 7 月至 2021 年 7 月，孙某良在兵哥梦公司没有实际生产经营活动、没有盈利能力的情况下，对外谎称兵哥梦公司由国企控股，具有资金实力，通过发放传单、集中宣讲、组织跟团旅游等方式开展宣传，向社会不特定公众非法集资。该公司通过与投资者签订《网约车经营权暨委托运营合同》《广告传媒项目合伙协议》等协议，承诺月息 3%，按月付

息、到期返本，或办理到期返本付息的“兵哥旅居”会员卡等方式，共向450余名社会公众募集资金2014万余元，集资款主要用于孙某良个人挥霍和还本付息，造成实际损失1673万余元。

【处理结果】

2022年1月18日，四川省成都市公安局青羊区分局以孙某良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移送起诉。同年6月17日，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人民检察院以集资诈骗罪对孙某良提起公诉。同年12月20日，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人民法院以集资诈骗罪判处被告人孙某良有期徒刑十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百万元。一审宣判后，被告人上诉，2023年5月8日，二审维持原判对被告人孙某良的定罪量刑。

三、实务研究

关于当前民商事审判工作的几点思考 文 | 刘贵祥

——摘自《中国应运法学》2023年第6期)

刘贵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副部级专职委员，二级大法官

内容提要：推进民商事审判工作现代化，必须强化政治意识。围绕“公正与效率”工作主题，坚持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相统一，克服“唯程序”和漠视程序独立价值的倾向，用好举证责任、释明权、合并审理等诉讼制度；狠抓司法廉洁建设，健全完善“促公正、提效率”的考核、监督、管理等制度机制。做深做实能动司法理念，发挥好司法建议、司法解释与司法政策、指导性案例与典型案例等的功能作用，通过“诉源治理”主动融入国家治理、社会治理。实现“三个效果”有机统一，把严格依法办案、追求法律效果作为基础，实现天理、国法、人情的有机融合，让裁判结果真正符合人民群众朴素的公平正义观。坚持系统观念，提升法律适用能力，综合运用法律解释方法，准确认定合同效力；处理好《民法典》与商事特别法、新旧法律、司法

解释的衔接适用问题，精准适用法律，避免损害当事人的预期利益。

关键词：民商事审判公正与效率
能动司法 “三个效果” 法律适用合同效力

文 章 目 录

引言

一、关于强化民商事审判的政治意识问题

二、关于民商事审判中的“公正与效率”问题

- （一）驰而不息抓司法廉洁
- （二）坚持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相统一
- （三）坚持“公正与效率”相统一
- （四）健全完善“促公正、提效率”的制度机制

三、关于民商事审判中的能动司法理念问题

（一）担当作为，做深做实为大局服务

（二）“抓前端，治未病”，做实诉源化解

（三）完善协同机制，实现双赢多赢共赢

四、关于民商事审判中“三个效果”有机统一问题

五、关于民商事审判中的系统观念问题

- （一）关于法律解释方法的综合应用
- （二）关于《民法典》与商事特别法的适用关系
- （三）关于新旧法律、司法解释的衔接适用

引言

在 2023 年 7 月召开的全国大法官研讨班上，张军院长明确要求，各级人民法院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围绕“公正与效率”工作主题，找准司法审判在全面依法治国这场革命中的职责定位，稳中求进、守正创新，做实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以审判工作现代化服务保障中国式现代化。民商事审

判工作应当如何将大法官研讨班的精神落到实处，需要重点研究探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关于强化民商事审判的政治意识问题

近年来，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围绕“公正与效率”工作主题，坚持“讲政治顾大局、促公正提效率、重自律强队伍”，做深做实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推动民商事审判工作在落实中深化、在深化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取得明显工作成效。

同时，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当前，我国经济持续回升向好，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但经济运行面临一些新的困难挑战，一些重点领域风险隐患仍然较多，外部环境复杂严峻，不确定性上升。因此，民商事审判工作在化解矛盾纠纷、维护社会稳定、防范化解风险、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等方面的任务十分艰巨。仅从商事类案件量看，2018年商事类案件为376万余件，到2022年达到625万余件，5年来案件量几乎翻了

一番，全国法院仅2023年上半年就收案342万件，案多人少矛盾仍然十分突出。特别是，新交易新模式新业态不断涌现，交易结构日益复杂，交易关系相互嵌套，交易链条明显拉长，导致涉诉纠纷法律关系性质认定困难。多个市场主体相互牵连，涉众型案件多发高发，牵一发而动全身，一些案件一旦处理不当就会严重影响社会合理预期和市场主体信心。与民商事审判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人民群众对司法工作的新要求新期待相比，民商事审判的理念，以及民商事审判队伍的政治素质、职业道德素质、业务素质等方面还明显存在不适应、跟不上的问题。例如，还存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不到位，把讲政治与讲法治割裂开来，缺乏“从政治上看，从法治上办”的实践意识和能力的问题；存在机械司法、就案办案，“三个效果”顾此失彼，能动司法理念未走深走实的问题；一些干警不善于依法利用证据规则、释明权查明事实真相，不注重实质性化解矛盾纠纷，减轻当事人诉累，而满足于“走程序”“走过场”；有些法官在适用法律时，还缺乏对法律精神、立法目的的深刻理解，缺乏对法律体系、历史演进的综

合考量，或望文生义，或片面理解，抓住一点不及其余，对法律的适用与社会公众一般认知、与人民群众的朴素公平正义观相悖。一些民商事裁判文书，要么简单武断得出结论，更谈不上法理情相融合，要么沉迷于长篇大论、自圆其说，而脱离法律真谛、社会现实甚至案件事实，在“头头是道”中迷失司法公平正义之根本要义。

面对困难与挑战，面对短板与弱项，民商事审判必须坚持问题导向，强化政治意识，提高政治站位，进一步加强党的创新理论武装，以理论上的高度清醒保持政治上的高度自觉。一是要全面系统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精思细悟中磨砺理论素养，在深学细照中升华思想境界，在知行合一中锤炼党性忠诚，进一步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全面提升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分析判断经济社会发展形势以及错综复杂的法律现象的能力和水平，全面提升民商事审判队伍的政治素质、业务素质、职业道德素质，全面提升“从政治上看”的意识和自觉，从“从法治上办”的本领和

担当。二是要坚持党的绝对领导。始终把拥护“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作为最高的政治原则和最根本的政治规矩，落实到民商事审判具体工作、具体职责、具体环节中，确保将党领导的政治优势转化为推进民商事审判现代化的强大效能。民商事审判与经济社会发展息息相关，要真正吃透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等重要会议的精神，确保民商事审判与党中央的重大决策部署保持高度一致，确保民商事审判不折不扣服务党和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三是要始终站稳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政治立场。把人民利益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更加自觉地倾听人民群众呼声，更加准确地把握人民群众的司法需求和期待，更加清醒地看到民商事审判与人民群众期待存在的较大差距，以“如我在诉”的司法良知，带着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和对人民群众的高度责任感，去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去办理每一件民商事审判案件，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不断厚植党的执政根基。四是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

彻底甩掉所谓“司法独立”“三权分立”的思想枷锁和“党大还是法大”的政治陷阱，旗帜鲜明讲政治，以高度的政治自觉激发能动履职的强大动力。在学习借鉴域外法律时，即便是对一些技术性的规范，也要去粗存精，考虑是否存在水土不服的问题，而不应不加辨别地奉为圭臬、照搬照抄。“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必须立足我国具体实际、立足我国的价值共识，去回答民商事审判中的时代之问、中国之问，充满自信地去解决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面临的民商法问题。事实上，在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进程中，我们有许多成功解决中国法律问题的理论构建和生动实践。例如，在国家是城镇土地唯一所有权人的情况下，通过在法律上创设可以出让及转让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这一法定物权的方式成功解决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土地这一主要市场要素的流转问题，充分体现出了中国人的法律智慧。又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独立成编而构建的独具中国特色的人格权法学理论体系、法律体系，关于需要审批的合同效力定位、违法合同的界限把握、合同僵局的破除

等疑难问题明确的相关规则，亦为世界民法学研究及司法实践发展贡献了中国方案。我们要善于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吸取养分，立足中国国情，强化使命担当，充满自信地提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法学理论观点、司法实践观点，逐渐构建起自主的法律话语体系、知识体系。

二、关于民商事审判中的“公正与效率”问题

党的二十大报告要求，“加快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公正与效率”是人民司法的本职要求和核心价值追求，是人民法院的永恒主题，也是司法权威、司法公信力的基础之所在。如何践行“公正与效率”这一主题？这是一个系统性工程，基于目标导向、问题导向，民商事审判要抓好切入点、着力点和结合点。

（一）驰而不息抓司法廉洁

司法廉洁是司法公正的基石，是公平正义的最基本要求。突破这一底线，司法公正就无从谈起，司法权威、司法公信力就无从谈起。司法不廉，不仅严重损害案件当事人的

合法权益，更会损害人民群众对司法工作的信心、信任，侵蚀党的执政根基。在全国法院每年大量的民商事信访案件、申请再审案件中，虽然经再审审查或重新审理后发现存在实质性错误的占比并不高，但仍存在老百姓信访不止、申诉不休的情况，其原因复杂多样，但不可否认的是实践中存在的一些司法不廉、作风不正现象，使人民群众不得不带着怀疑的眼光和不信任的心态去质疑一些案件的裁判结果。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要懂得‘100-1=0’的道理，一个错案的负面影响足以摧毁九十九个公正裁判积累起来的良好形象”。司法不廉是公正司法的最大毒瘤，民商事审判必须以坚定的自我革命精神，驰而不息与各种司法不廉现象作斗争，坚决遏制直至消除一切以案谋私、枉法裁判现象，持久保持不敢腐的高压态势；必须严格司法程序、严肃办案纪律，把“三个规定”的严格执行作为防范不法干预、利益勾连的有力抓手，不断完善审判权运行机制、约束机制、监督机制，切实扎紧不能腐的制度机制篱笆；必须加强理想信念、司法良知和职业道德教育，培根固元，将司法不廉作为最大耻辱，把公平正

义作为镌刻在法官心中的价值坐标，把“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作为矢志不渝的奋斗目标，真正信仰法治、坚守法治，以“不畏人知畏己知”的慎独精神，努力打牢不想腐的思想基础。要以坚定的决心和坚强的毅力，久久为功，在民商事审判领域形成风清气正的良好氛围，以高度的司法廉洁赢得人民群众高度的信任和信心，进而提升民商事审判的公信力和权威性。

（二）坚持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相统一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三符合、两公正”的客观标准，即事实认定符合客观真相、办案结果符合实体公正、办案过程符合程序公正。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相辅相成、密不可分。实体公正是程序公正的目的之所在，程序公正是实体公正的重要保证，其本身即蕴含着实体公正的要求。

在民商事审判实践中，要克服两种错误倾向。一是“为走程序而走程序”的“唯程序”倾向。人民群众

向法院提起诉讼，归根结底是要得到一个公平公正的实体性裁判结果，而不是来“走程序”“走过场”的。离开了追求实体公正的目的，形式主义化地“走程序”，不仅难以保障实体公正，还会出现程序空转、案结事不了问题，徒增当事人诉累。例如，在一些案件中，本可在一个程序中解决的问题，却以“另行提起诉讼”进行“技术处理”；本可引导当事人明确诉求、提出反诉，通过诉的合并一揽子解决纠纷，却无所作为、分案处理。有的法院对于当事人上诉的二审案件，本来可以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依法改判，但为避免“自找麻烦”而将案件发回一审法院重审，将矛盾“下推”。表面看，其符合发回重审的程序性规定，但问题在于我国法律并未规定二审不能进行“事实审”，在二审阶段，当具备查明事实的能力和条件时，或者发回一审法院同样面临查清事实的困境时，二审法院应当依法担当，充分发挥二审的程序价值。否则，若仅选择将案件发回重审，将会导致诉讼周期不必要的延长，进而影响到诉讼效率。不可否认，对于一些疑难复杂案件，发回重审可能更有利于查清事实，或更有利于就地以调解方式化

解纠纷、解决矛盾，一些严重程序违法以致于影响实体裁判公正性的案件，依法也应发回重审，但“推卸责任式”的发回，是必须要坚决杜绝的。又例如，在一起公司代表诉讼中，当事人以公司与相对人恶意串通为由主张公司向关联企业转让子公司股权的行为无效。一种观点认为，虽然该交易不公平，但本案实际是关联交易的正当性问题，当事人诉讼理由错误，应当驳回，让其另诉。这是典型的机械司法！在另一案件中，判决发包方 A 公司在拖欠工程款范围内与承包方 B 公司对实际施工人 C 公司的劳务款承担连带责任，但对 A 公司拖欠多少工程款不予审理，更不予明确，如何执行？C 公司不得不又提起一个工程款纠纷的诉讼，这不仅使当事人徒增诉累，而且还拖延了其权利实现的周期。二是漠视程序独立价值的倾向。由于人民法院认定的事实是当事人通过证据证明的事实，适用的法律是经过当事人辩论后确定的法律，离开了正当程序保障，事实就不能被正确认定，法律也很难被准确适用，也就谈不上实现实体公正的问题。人民群众感受到的、看得见的公正很大程度上也是程序公正。因此，对于遗漏必

须参加诉讼的当事人、合议庭成员该回避的没有回避、违法缺席审判等严重违法法定程序进而影响实体公正的案件，除调解外，不得不依法发回重审，补齐程序缺失。即使是一些不影响实体公正的程序瑕疵，也会使当事人申诉、信访不止。大量的民商事信访案件表明，一些案件虽在程序上存在“小毛病”，确又无引起审判监督程序之必要，更无进行实体改判之余地，但要说服当事人息诉罢访则要费尽周折。可见民商事审判工作要充分认识诉讼程序的独立价值，牢固树立程序意识，摒弃和纠正不尊重当事人诉权、辩论权、陈述权、知情权，以及怠于督促当事人履行诉讼义务的观念和做法。

运用好程序制度，实现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相统一，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需要重点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要准确理解和适用举证责任制度。要处理好“谁主张、谁举证”与人民法院依职权调查证据的关系，使法律事实最大限度地接近、还原客观事实。既要充分调动当事人举证的积极性，压实当事人法定的举

证责任，彰显举证责任分配规则的司法引导作用，也要正确认识“谁主张、谁举证”规则和所谓“当事人主义”的不足和局限，在依据现有证据认定的事实可能严重背离事实真相，作出的裁判结果可能有悖常理、有悖公平正义时，人民法院不能坐视不管、放任自流，而要通过依职权调查取证、合理运用举证责任转换规则等方式，并避免僵化运用新证据和举证期限规则，尽可能还原客观真相，达到内心确信。以最高人民法院处理的一起合同纠纷为例，合同约定的价款为6亿元，但结合缔约背景、缔约过程、协议性质、市场价格等情况，认为该价款约定严重有悖常理，而主张其法定代表人与对方恶意串通的甲公司不能举证证明其主张。合议庭依职权调取相关刑事卷宗，从中查阅到另外一份协议及法定代表人与本案有关的受贿行为。经质证后，认定了恶意串通的事实，使案件得到公平公正处理。由此，有关审判庭举一反三，形成法官共识性规则，即凡是在民事案件审理过程中，基本事实认定涉及渎职类犯罪的，要依职权调取刑事卷宗，查明相关渎职类犯罪与民商事案件的关联性，以正确认定事实，此种做法

殊值肯定。此外，在民商事案件中，一些当事人出于各种目的进行虚假诉讼，还有一些当事人事先设计好骗局或“商业陷阱”，如果机械地依据“谁主张、谁举证”的证据规则一判了之，要么损害公共利益或第三人合法权益，要么背离人民群众最基本的公平正义观念，甚至引发极端事件。这就有必要基于实体公正的价值取向，在法官审理案件中依经验和常理对关键、重大事实产生合理性怀疑时，要通过必要而合理的诉讼引导、举证提示，甚至通过依职权调查、依法中止诉讼移送侦查部门等措施，达到真正查明事实之效果。

二是要善于依法行使释明权。在当事人确实遭受了损害，但因诉讼请求不当而无法得到救济时，就要通过依法行使释明权，促使当事人变更诉讼请求来解决前述矛盾。例如，基于合同有给付行为的原告请求确认合同无效，但并未提出返还原物或者折价补偿、赔偿损失等请求的，人民法院应当向其释明，告知其一并提出相应诉讼请求。原告请求确认合同无效并要求被告返还原物或者赔偿损失，被告基于合同

也有给付行为的，人民法院同样应当向被告释明，告知其也可以提出返还请求。需要注意的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53条第1款的规定，“诉讼过程中，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性质或者民事行为效力与人民法院根据案件事实作出的认定不一致的，人民法院应当将法律关系性质或者民事行为效力作为焦点问题进行审理”。此时，即使当事人没有根据法庭辩论的情况申请变更诉讼请求，也应在判决书中直接对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及其效力作出认定。再例如，在审理合同纠纷时，当事人主张合同无效或者请求撤销、解除合同等，人民法院认为合同不成立的，就应当依据上述规定将合同是否成立作为焦点问题进行审理，并可以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重新指定举证期限。

三是要依法运用合并审理等制度。最高人民法院在制定《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合同编通则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民法典合同编通则解释》）时，特别规定了一些合并审理的制度规则，以达到一次性、实质性解决矛盾纠

纷的目的。例如，在债权人行使代位权时，可以将两个以上债权人以债务人的同一相对人为被告提起的代位权诉讼进行合并审理，如果债务人对相对人享有的债权不足以清偿其对两个以上债权人负担的债务，人民法院可以按照债权人享有的债权比例确定相对人的履行份额。又如，在债权人向人民法院起诉债务人以后，又向同一人民法院对债务人的相对人提起代位权诉讼的情况下，如果该诉讼属于该人民法院管辖，可以依法合并审理；如果不属于该人民法院管辖，就应当告知其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另行起诉，并在起诉债务人的诉讼终结前，依法中止代位权诉讼。再如，债权人行使撤销权时，也可以将债权人撤销权诉讼与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依法合并审理。不仅如此，债权人行使撤销权时还可以一并请求相对人向债务人返还低价或无偿转让的财产。如此一来，当债权人获得胜诉判决后，就形成了相对人向债务人给付、债务人向债权人给付的连环给付关系，为确保实现债权人的胜诉利益，在执行程序中可以直接赋予债权人向债务人的相对人

申请执行的权益，实现审判程序与执行程序的有效衔接。

此外，对于涉及众多当事人的复杂交易，人民法院也可以通过追加相关当事人为共同被告或第三人的方式，既方便查明事实、准确认定交易性质，也有利于一揽子解决纠纷。例如，在审理票据清单交易纠纷时，在出资银行仅以整个交易链条的部分当事人为被告提起诉讼时，人民法院应当在依法行使释明权的基础上，追加参与交易的相关当事人为共同被告参加诉讼。

（三）坚持“公正与效率”相统一

司法的功能在于及时定分止争，如果案件长期未结，纷争就会一直“悬而未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就无法得到保障。有的案件在诉讼中保全被告财产后长时间不作出裁判结果，有的案件迟迟不开庭、开庭后又迟迟不作出裁判结论，更有甚者在裁判文书签发后因种种原因迟迟不送达裁判文书，这些做法既无“效率”，也谈不上“公正”，或者说是打了折扣的公正。民商事案件久拖不决，甚至会拖垮一个企业，影响一个家庭的生计，贻害无穷。近期，最

高人民法院大力清理长期未结案件，严格审限制度，严把延长审限关，在“提效率”上采取一系列措施，道理也在于此。另外，民商事审判的效率是建立在公正基础上的效率。张军院长深刻指出，“如果只是追求‘结案了事’，那结果很可能是‘萝卜快了不洗泥’‘一案结而多案生’”。可谓一语中的、入木三分。

值得注意的是，民商事审判对效率的要求与民事执行在理念上存在差别。在民商事生效裁判已就当事人的权利义务确定的情况下，民事执行要及时实现胜诉权益。从这一意义上而言，执行的快速性、及时性本身就是公正性的体现，是裁判公正性的延伸。效率是执行程序的基本价值追求，执行程序奉行“债权人中心主义”，强调执行行为的连续性、不间断性。“执行异议期间，不停止执行”这一规则，实质上就是公正对效率的暂时让步。对于执行案件的债权人来讲，“时间就是金钱”。近年来，最高人民法院致力于推行以现代信息技术为支撑的财产查控模式、财产处置模式、联合信用惩戒模式，目的就是不断提高执行效率，尽快将“真金白银”装进胜诉当事人

口袋，打通维护公平正义的“最后一公里”。当然，执行程序重效率，也不能忽视执行权的公正性，必须坚持合法性原则、比例原则，执行措施不仅要合法，也要适当，不能突破法律底线、违反法定程序；也不能超过必要限度，损害被执行人及利害关系人的合法权益。执行程序中还往往涉及案外人合法权益，法律为案外人设置了异议之诉这一救济程序，这也是民商事审判中的重要问题之一。执行异议之诉，既是对执行程序的审判监督，又是平衡有关当事人权利冲突、保障执行公正性的重要法律制度。实践中，执行异议之诉案件增长较快，但裁判观点分歧较大，确保裁判公正性的核心理念应该是“不应以他人的财产去清偿被执行人的债务”，不应简单地以权利外观去判断能否排除执行，也不应简单地以“案外人对标的物不享有物权，不能对抗第三人”而得出不能排除执行的结论。在执行异议之诉案件审理中，必须吃透我国民商法的制度体系，依法作出符合我国实际、符合人民群众朴素公平正义观的判断。

（四）健全完善“促公正、提效率”的制度机制

抓实公正与效率，必须要有制度保障，必须大力推进审判管理现代化。最近，最高人民法院推出了一系列强化审判管理的措施，其切入点、着力点在于：

一是绩效考核科学化。为解决审判质量管理指标体系不尽完善、不够科学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经充分调研重新制定了指标体系，并在全国法院试行。新的指标体系坚持质量优先、兼顾效率、关注效果，设置了“案一件比”这一核心指标，目的就是引导各级法院用最优质量、最佳效果尽可能一次性化解矛盾纠纷，避免有的法官为追求所谓效率，草草结案，导致当事人后续上诉、申诉。新的指标体系还将“结案率”的考核区间由过去的“年度”修改为“审限”，设置了“审限内结案率”这一指标，既能有效督促承办法官提高工作效率，尽快办理案件，又能防止出现过去有些法院为提高年度结案率而在年底不立案的问题。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效果指标设计中，把裁判文书的自动履行率作为重要考量因素，对于提高民商事裁判公正性、当事人的认可度，推动解决执行难都大有裨益。

二是司法责任明晰化。在坚持“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办案责任制的基础上，要强化监督制约、放权不放任，实现有序放权与有效监督相统一，切实解决院庭长监督责任缺失、不愿监督、不敢监督、不会监督等问题。为此，最高人民法院以“阅核制”为抓手来落实落细院庭长监督管理责任，并制定有关具体规则。首先，院庭长阅核不同于审批，不能背离“让审理者裁判”的初衷，即院庭长可以提出意见建议，并由合议庭复议、专业法官会议讨论，或者提请审委会讨论，但不能改变合议庭的结论。其次，阅核是一种监督职责，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也要承担相应的责任，以此形成审理者、监督者各负其责的多层次责任体系。既要避免阅核流于形式，或为合议庭自负其责“背书”，更要避免合议庭依赖于阅核而怠于履行自身职责。最后，“阅核制”也要在明确规则下运行，特别是要借助现代信息手段做到全程留痕，使监督者自身也接受监督，切实避免其异化为合法外衣下的“非法干预”“权力滥用”。

三是条线管理制度化。民商事审判涉及经济社会方方面面，担负着维护社会秩序稳定、保障经济金融安全、防范重大风险等重要职责，必须发挥上级法院尤其是最高人民法院、高级人民法院统一裁判尺度、总结司法经验、加强对下监督指导的条线管理功能作用，这是事关法治统一、事关审判全局的重要责任。要提高政治站位、开阔视野，准确分析判断一个阶段面临的经济社会形势，提出服务党和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的工作思路、工作重点，使各级法院能动地做深做实做准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要通过办理案件和深入一线调研，对民商事审判中出现的关于法律适用的新问题和悬而未决的老问题，找到既切实可行又符合法治精神的解决方案，统一裁判尺度、提高裁判效率，进而增强社会合理预期，提升民商事审判公信力。要通过案件管理系统，及时发现和把握过长交易链条引发的多起关联纠纷、同一主体通过类似法律事实引发的多地诉讼，加强沟通协调，必要时依法指定管辖、集中管辖，避免“打乱仗”“无序诉讼”“多重查封”。要充分发挥“法答网”的功能作用，审慎而及时地研究回答

下级法院所提出的法律适用问题，使“法答网”成为民商事审判中提出问题、讨论问题、解决问题的重要平台。目前，“法答网”上所提出的诸多民商事法律适用问题，都具有极高的理论价值、实务价值，使上级法院能够更加精准地加强对下指导，最高人民法院所提出的解决方案，受到广泛好评。要定期对民商事审判的数据进行量化分析、定性分析，把握案件动态，发现存在的突出问题，通过指导意见、会议纪要、视频会议等形式及时采取纠偏措施、形成正确导向。要认真分析“发改指”案件及信访案件，发现存在裁判不规范、滥用自由裁量权，甚至徇私枉法等问题的，及时向纪检监察部门移送线索、通报情况，确保对条线司法廉政问题早发现、早出手，消灭在萌芽状态，切实避免出现系统性、塌方式腐败。

三、关于民商事审判中的能动司法理念问题

在民商事审判工作中做深做实新时代能动司法，是更加自觉、更加主动、更加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的必然要求，也是抓实“公正与效率”

工作主题，卸掉教条主义、机械主义的理念枷锁，加快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具体体现。

（一）担当作为，做深做实为大局服务

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是民商事审判的职责使命所在。要以敏锐的政治眼光，高度关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背景下经济社会形势的重大变化、社会矛盾的历史性变化，切实把握党中央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所提出的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切实把握各类风险隐患的多元多变、维护改革发展稳定大局任务的艰巨性，认清形势、拓宽视野、把握大局，找准服务大局的结合点，精准服务大局。

一是以高质量金融审判服务保障金融强国建设。习近平总书记在最近召开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上发表的重要讲话，科学回答了金融事业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为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民商事审判要深刻领悟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把握好金融的政治性、人民

性，把握好金融规律、审判规律，在法治轨道上推进金融创新发展，维护好实现好金融消费者、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服务好保障好金融强国建设。要准确适用法律，处理好民法一般规定与金融法律、法规及监管政策的关系，把握好涉及公共利益的重大金融监管政策在合同效力判断中的作用，把握好一般监管规则在判断民事法律关系性质、民事责任认定以及法律解释、合同解释等方面的参考价值。会议提出全面强化机构监管、行业监管、行为监管、功能监管，既管“有照上路”，又管“无照驾驶”。这些金融监管政策的变化，对有关合同效力如何认定，民事责任如何认定，需要有新思路新理念。要坚决守住不发生重大金融风险底线，认真总结前期参与处置一些重大风险的经验，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在府院联动机制的框架下，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原则，充分利用破产法、公司法等一系列法律制度工具，化解房地产领域、中小银行等风险隐患，维护国家金融安全。要用好证券欺诈集体诉讼制度，使这一制度在实践中的应用常态化，进一步释放对证券市场欺诈行为“零容忍”的司法信号，切实

护航全面实行注册制改革。要依法打击金融违法犯罪行为，以刑事、行政、民事手段多维度追责、追赃、挽损，让违法犯罪者付出代价，让合法权益得到有效维护，让金融市场秩序得到有效保障。

二是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全面贯彻平等保护原则。要将各类主体诉讼地位、诉讼权利平等贯穿到民商事审判全过程各方面，强化对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司法措施供给，加强对民营企业产权保护，健全涉企产权冤错案申诉、再审及有效防范和甄别纠正机制。要严格区分经济纠纷、行政违法与刑事犯罪，坚决防止和纠正利用行政或者刑事手段干预经济纠纷，坚决防止和纠正把经济纠纷认定为刑事犯罪、把民事责任认定为刑事责任。要加强对民营企业名誉权和企业家人身自由、人格尊严以及个人信息、隐私权等人格权益的司法保护，充分发挥人格权侵害禁令制度功能，及时防范和制止侵害人格权的违法行为。因企业名誉权受到侵害致使企业生产、经营、销售等遭受实际损失的，应当依法判令行为人承担赔偿责任；因编造、

传播虚假信息或者误导性信息扰乱企业发行的股票、债券市场交易秩序，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判令行为人承担赔偿责任，有效推动营造有利于民营经济发展的舆论环境、法治环境。

三是挽救有营运价值的企业，清出僵尸企业。要强化破产保护，“要救早救”，充分发挥破产制度早期防护作用，发挥破产制度保全债务人财产和营业完整性、抑制债务膨胀的功能，引导陷入困境的市场主体尽早运用破产重整妥善化解债务危机。确保“要救真救”，决不能把重整制度异化为资本游戏，追求短期效应，再薅一次中小投资者的“羊毛”。特别注意加大对中小微企业运用重整程序、和解程序进行救治的力度，既降低企业杠杆，又解决企业治理方面的沉疴积弊，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要充分利用破产清算制度，果断出清僵尸企业、无挽救价值的企业，释放市场资源和社会管理资源。要推动完善破产相关配套制度，充分发挥制度集成和协同效应，最大程度释放破产制度红利。例如，要强化对大股东非经营性占用财产行为的惩防，对于大

股东通过虚构交易或者直接划转等方式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行为，破产中要通过依法对大股东权益清零、要求大股东以现金清偿或者以符合监管要求的资产进行非现金清偿等方式，有效解决资金占用问题。要提升破产效率，对简单案件，在听证、通知、债权人会议、债权审查认定、财产清查、财产变价等环节可以进行标准化、格式化处理，力求快审快结。要降低破产成本，以按劳分配为基本原则，恰当合理确定管理人报酬。债权人未实际获得清偿，或者债权人所分得的清偿价值尚未实现或不确定的，不能将其作为管理人报酬的基数。

（二）“抓前端，治未病”，做实诉源化解

“治未病”，体现了中华文化绵延千年的优良传统，凝结着华夏文明治国理政的智慧精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国情决定了我们不能成为‘诉讼大国’”。“法治建设既要抓末端、治已病，更要抓前端、治未病。”面对不断增加的民商事案件，人民法院要积极通过推进“诉源治理”主动融入国家治理、社会治理，

努力减少多发、高发案件，助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一是充分发挥司法建议的社会治理功能。正如张军院长指出的，“有的领域同类案件多发、高发，背后必然存在社会治理的问题，要通过案件审理，发现并促进解决政策制定、行业监管等方面的根源问题，让更多案件消解于无形，促进社会治理，就是抓住了治本之策”。例如，信用卡纠纷案件近年来大幅上升，2018年全国法院审理44.7万件，2022年审理78.3万件，增长了75.2%，占一审金融民商事案件结案总数近三成。针对民商事审判中信用卡纠纷占比较大且上升较快等情况，最高人民法院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向监管部门发出司法建议，共同推动行业治理。又如，依据《民法典》第221条的规定，不动产预告登记具有对抗他人的物权效力，但由于宣传、提示不到位，实践中在购买房屋时办理预告登记的极少，但办理网签备案的极为普遍，现行法律却未赋予网签备案对抗他人的物权效力。人民法院在强制执行开发商为被执行人的案件且查封登记在其名下的房屋时，几乎所有的案外

人都会以其已购买该房屋并已办理网签备案为由提起排除执行的异议。由于网签备案不具有排除执行的物权效力，案外人的执行异议不易获得法院支持，引发大量执行异议之诉案件。这反映出我国预告登记制度与网签备案制度未能实现有效衔接，存在治理漏洞。为此，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率先向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发出司法建议，在省政府协调推动下，实现了网签备案和预告登记机制全面衔接，取得了良好效果，该省2022年执行异议之诉案件同比减少20%。考虑到这是在全国普遍存在的现象，最高人民法院也向有关部门发出司法建议，商请在商品房买卖合同示范文本中增加办理预告登记的条款，在合同备案平台或者窗口加大预告登记的宣传和引导，并加快推进合同备案与预告登记同步申请办理，从根源上减少矛盾争议的发生。除此之外，当前，保证保险纠纷所反映出的恶性竞争、诱导金融消费、强制搭售等问题，产融集团企业风险案件反映出的产业资本向金融资本渗透问题，中小金融机构风险案件反映出的大股东以隐名持股等手段超过法定比例持股问题、违反贷款集中度规定问题，上

市公司风险案件中反映出的控股股东经营性、非经营性占用上市公司资产、非正当关联交易、治理结构虚化弱化、股东协议产生的暗箱治理等问题，都应当在进一步调研的基础上通过与有关部门沟通情况、发出司法建议等方式实现共治共管、诉源化解、防范风险。

此外，依据原《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以下简称《物权法》）第202条的规定，抵押权人未在主债权诉讼时效期间行使抵押权的，抵押权不受国家强制力保护。依此规定，抵押权过了诉讼时效后，虽然抵押权人不能行使抵押权，但抵押人也不能注销抵押登记，抵押财产上仍有权利负担，影响抵押财产的流转。为破解这一僵局，实现物尽其用，《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59条规定，在此情况下，抵押人可以向人民法院请求注销抵押权登记。因《民法典》第419条延续了原《物权法》第202条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在之后出台的《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有关担保制度的解释》（以下简称《民法典担保制度解释》）中没有沿用《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

第 59 条 的规定，导致问题又回归到了原点。最高人民法院经与登记部门沟通，明确在人民法院生效判决认定抵押权人不能行使抵押权的情况下，可以在登记簿上备注这一事实，从而达到与办理抵押权注销登记相同的效果，实现司法与行政管理有效衔接，解决实践中的社会治理问题。

二是充分发挥司法解释、司法政策的规范引导功能。通过出台司法解释、规范性意见等方式，让社会充分了解人民法院对一些交易模式的司法态度、裁判尺度，形成合理预期，使商业行为更加规范，防范更多纠纷的发生。即便发生纠纷，当事人也能够参照公之于众的司法解释自行协商解决纠纷，从而达到非讼化解纠纷的效果。例如，上市公司违规对外担保长期以来都是资本市场的“毒瘤”，其中很大的一个原因是司法对上市公司对外担保的合同效力认定尺度不一，债权人有意无意地忽视对上市公司所提供的担保是否履行了公司内部决议程序的严格审查。有鉴于此，《民法典担保制度解释》第 9 条 规定，相对人在未审查对外担保是否进行公开信息披露的

情况下，就与上市公司签订担保合同的，担保合同对上市公司不发生法律效力，上市公司不承担任何责任，以此倒逼相对人加大审查力度。该司法解释出台后，上市公司违规对外担保的情况几乎很少发生，达到了源头化解的预期效果。例如，关于代持股问题，如果实际出资人没有法律规定的持股资格而由他人代为持股，从民商事审判的角度，只能解决当事人之间的民事权利分配问题，而不能直接没收其违法所得。但是，可以考虑在对双方的民事权利义务作出认定后，向监管部门提出个案性的司法建议，由其进行行政处罚，以儆效尤，使司法裁判与行政监管形成有效衔接。

三是充分发挥指导性案例、典型案例的引导功能。案例作为司法产品，是法律实施和政策落实的晴雨表，承载着人民法院对公平正义的判断和裁量，也蕴含着人民群众对公平正义的感知和期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司法公正对社会公正具有重要引领作用”“一个案例胜过一打文件”民商事审判在个案处理过程中，不能局限于就案办案，要考虑个案的典型意义、规则引领价值、

对社会治理和审判管理有何经验教训等，努力实现个案价值类案化、促进管理治理效果最大化。目前，最高人民法院在大力推行案例指导制度的同时，正在建设人民法院案例库，通过汇聚各类指导性案例、参考性案例、典型案例等，积沙成塔、集腋成裘，形成法官检索类案以统一裁判尺度、提高办案公正与效率的资源库，形成市场主体、社会公众规范市场行为、防范诉讼风险的资源库。在民商事审判中，应当充分认识案例库建设现实而长远的意义，以高度的责任感形成、筛选、推送案例，使案例库成为汇聚中国法官司法智慧、独具中国特色的司法宝藏。

（三）完善协同机制，实现双赢多赢共赢

民商事审判要充分发挥服务大局的职能作用，必须在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下，加强与政法各部门、行政管理部门、行业协会等方面的沟通协作，形成相应的协同机制，在共治共管中实现双赢多赢共赢。首先，要建立健全政法机关之间的协调机制。重在协调解决民刑交叉案件的程序选择和事实查明问题，以及多头查封、重复查封、相互掣肘等问题，提

高民商事审判的可预期性和公信力。其次，要建立健全与行政机关的协同治理机制，在处理有重大影响、社会关注度高的重大案件时，深入了解相关监管措施，听取监管部门意见，需要行政处置先行或者以政府主导下行政处置先行更有利于化解风险、保护各方权益的，要把握程序节奏，做好先期配合工作，确保行政处置在法治轨道进行，并保持与以后的司法程序在法律适用上的连贯性、一致性，使风险协同处置具有可推广、可遵循的模式效应。最后，要建立健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严格落实新时代“枫桥经验”工作要求，将诉调对接工作的“调”再向前延伸，在党委、政法委领导下，共同抓好矛盾化解和综合治理，从源头上减少矛盾纠纷。

四、关于民商事审判中“三个效果”有机统一问题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全面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的一场深刻革命”，要“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我们要深刻领会这一重要论断的精髓要义，把严格依法办案、追求法律效果作为实现“三个效果”统一的基础。“自由

裁量必须严格依法作出，牺牲法律效果片面强调所谓的‘政治效果’‘社会效果’，不会实现好的政治效果和社会效果。”这其中的道理在于，我国的法律是在党的领导下制定的，是广大人民群众意志的体现，是党和国家大政方针的体现，法律规范本身包含着浓厚的、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政治制度、优秀传统文化相适应的政治考量、价值判断和利益衡量。从一定意义上而言，只要准确适用法律，就能产生好的法律效果，也必然会产生好的政治效果、社会效果。实践中，之所以出现“三个效果”不统一的问题，有相当一部分原因是我们对法律的理解出现了偏差，或断章取义，或张冠李戴，缺乏体系思维，忽视了法律规范之间的关联关系，围着某一个法律条文“打转转”，生搬硬套。在法律适用错误的情况下，政治效果、社会效果便无从谈起。

民商事审判案件涉及的法律关系往往错综复杂，在审理过程中一般难以找到一加一等于二的现成答案。这就需要运用科学的法律解释方法去解释法律、理解法律，甚至依据一定的规则、方法去填补法律漏

洞，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自由裁量权。首先，在解释法律时，要探求法律的精神和目的，要保持与立法所追求的政治效果、社会效果的一致性，保持与立法所包含的、所追求的价值判断和利益衡量的一致性。既要充分引入政治效果、社会效果的考量，又不脱离法律的基本原则、立法目的、价值判断和利益衡量。一言以蔽之，要在法治轨道上、在规范约束下去行使自由裁量权，切实避免自由裁量权成为脱缰野马、恣意妄为，避免脱离了法律效果的所谓的政治效果、社会效果。其次，无论如何具有前瞻性、科学性的立法都不可能把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各种新情况新问题都预见到，难免会出现规则缺失或者滞后的问题。民商事审判要善于联系现实情况，以公平正义的价值取向找出解决问题的法律答案，要以法律解释方法填补制定法的漏洞，而不能思维固化，抱守现行法律而忽视现实情况的变化。总而言之，在行使自由裁量权时，要使法律效果与政治效果、社会效果浑然一体，切实完成“从政治上看、从法治上办”的思辨过程。

“三个效果”统一要讲透法理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法律不应

该是冷冰冰的，司法工作也是做群众工作。一纸判决，或者能够给当事人正义，却不一定能解开当事人的‘心结’，‘心结’没有解开，案件也就没有真正了结”。民商事审判要让司法裁判与民意同频、与社情共振，要以法为据、以理服人、以情感人，既要义正严词讲法理，又要循循善诱讲事理，还要感同身受讲情理，实现天理、国法、人情的有机融合。例如，党中央作出“保交楼、保民生、保稳定”的重大决策，民商事审判应如何贯彻落实？“保交楼”不是保违法违规经营的房地产商，而是让买房的老百姓能够拿到花钱所买的房子，但一个房地产项目面临的权利人既包括购房人，也包括材料供应商、银行债权人、建筑商债权人等，“僧多粥少”。在国家政策支持下，一些“烂尾”的楼盘终于可以交房，如果前述债权人都来“分羹”，通过拍卖房屋来受偿债权，购房人取得房子的权利将难以保障。基于这一考虑，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关于商品房消费者权利保护问题的批复》（法释〔2023〕1号），明确在多个债权人就唯一房产项目主张权利的情况下，最优先保护以居住为目的的购房人的权利。该批复是依据《民法

典》的基本原则和立法目的，并参照《民法典》第404条有关动产的正常经营买受人登记查询豁免的机理，进行充分的价值判断和利益衡量后作出的解释。其中的政治效果考量是从司法层面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厚植党的执政根基；社会效果考量是社会大众一般认识和朴素的公平正义观；利益衡量是居住是基本的生存需求，生存权大于财产权。

“三个效果”统一要符合人民群众朴素的公平正义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依法公正对待人民群众的诉求，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决不能让不公正的审判伤害人民群众感情、损害人民群众权益”。人民性是司法工作的根本立场，人民评价是司法公信力的唯一标尺。在民商事审判中，必须更加重视释法说理，让裁判结果真正符合人民群众朴素的公平正义观。例如，在处理实际买房者请求法院排除对具名人名下房屋执行的异议之诉案件中，能否支持实际买房人排除执行的诉求？该问题在司法实践中极具争议，肯定观点、否定观点均有一定道理，笔者在此提出一些思考路径供研究参考。此问题的解决，需结合《民法

典》规定的房屋登记的公信力制度、善意取得制度、外观主义的边界等基础法律制度去分析，此处不赘。此外，需要考量的法律依据、价值判断还包括：其一，即便是实际买房人因限购原因不能取得物权，但其起码对具名人享有债权，而申请执行人也是普通债权，这就需要对同质化权利进行比较：实际买房人是占有房屋的债权人，而申请执行人是未占有房屋的债权人，优先保护已占有房屋的债权人符合法律逻辑。在实际买房人合法占有房屋的情况下，又有何理由排除其合法占有？其二，《第八次全国法院民事商事审判工作会议（民事部分）纪要》第15条、《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8条第1款、《关于审理涉及国有土地使用权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9条均体现了不动产在“一物多卖”情况下同质化权利存在冲突时，一般应优先保护先占有者权益的思路。执行异议之诉中的实际买房人与申请执行人的权利冲突与上述规定涉及的问题类似，类似问题可以类似处理。以上两点主要是从法律逻辑上分析的。其三，从价值判断和利益衡量上来看，如果其借

名买房以居住为目的，即使借名人有规避限购政策等过错，也无违反“房住不炒”这一房地产公共政策定位之虞。除非将借名买房作为炒房的手段，否则不宜以违反公序良俗似是而非地剥夺其居住权。对于大部分普通人而言，房子可能是他们倾尽全家之力、用毕生劳动成果换取的最为宝贵的财产。仅仅因为借用他人名义，就导致自己的房子被用来偿还他人的债务，这显然是无法让人接受的，更与一般人民群众朴素的公平正义观念相去甚远。如果人民法院支持了申请执行人的请求，那么实际购房人必然再诉具名人，以至衍生出更多的案件。至于对于实际买房人与具名人规避限购政策的过错，则可以通过个案司法建议，交由管理部门依法予以处罚。

又如，在房地产领域出现风险隐患的情况下，一方面要严格审慎把握商品房买卖合同的解除条件，防范房产价格下行情况下的道德风险；另一方面，在房地产买卖合同被解除的情况下需平衡好各方利益，对按揭贷款偿还责任的认定也要符合人民群众一般的公平正义观念。在这方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

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也有可资依据的规定。

再如，近年来，部分房地产企业为延长账期、缓解资金周转压力，频繁使用商业承兑汇票进行债务结算和支付，很多供货商为了尽快回笼资金，往往又选择在汇票到期前和受让人订立债权转让合同打折甚至低价转让汇票。随着房地产市场效益大幅减速，房地产企业出现大量债务违约，票据兑付风险随之产生。汇票到期受让人提示付款被拒的，能否向汇票出让人即供货商进行追索，是司法实践中面临的棘手问题，各地法院做法也不尽一致。有的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以下简称《票据法》）第61条的规定，汇票到期被拒付的，持票人可以对背书人、出票人以及汇票的其他债务人行使追索权。房企供货商因背书成为票据债务人，应承担票据责任。有的认为，票据未得到承兑前，基础债权及票据权利并存，房企供货商背书票据是因债权转让，是债权转让约定的附随义务，在无明确约定的情况下，让房企供货商承担票据责任无基础法律关系，应将

房企供货商从票据债务人中涤除，仅判决房地产企业承担票据责任。以上两种思路和处理方式都有一定道理。但实践中此类纠纷交易模式繁多、合同约定不同，情况复杂，既涉及票据法问题，又涉及债权转让一般民商事法律制度问题，更有价值判断和利益衡量问题，既不能忽视商票交易的规律和特点，又不能忽视真实交易关系与票据交易的关联性。总体而言，不能一概按单纯的票据关系简单化处理，要区别具体商票交易场景，根据交易主体情况、是否存在真实的交易关系等因素，判断是属于票据关系还是穿透后的债权转让关系而作出裁判。最高人民法院将在深入调研、广泛征求意见并进行效果评估的基础上，找出一条公平公正处理此类纠纷的统一裁判思路。

五、关于民商事审判中的系统观念问题

司法解决纠纷的过程，就是寻找事实、寻找法律的过程，即在准确认定事实的基础上，精准适用法律，作出公正裁判，实现个案公正，以司法公平正义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从这个意义上讲，民商事审判要做

深做实“公正与效率”工作主题，贯彻落实能动司法工作理念，使裁判结果达到“三个效果”有机统一，必须不断提升法官适用法律的能力。法律适用能力是法官的“基本功”，是实现案件公平正义的逻辑起点。

党的二十大报告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概括为“六个坚持”，其中就包括坚持系统观念。系统观念要求用普遍联系的、全面系统的、发展的观点来观察事物，进而把握事物发展的规律。在民商事审判中适用法律时坚持系统观念，就是要将待决案件涉及的法律问题置于整个法律体系中进行判断，从而避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重点要处理好两个层面的问题：一是要特别关注法律规范的系统性。法律规范是一个系统整体，在横向上要以普遍联系的而不是单一孤立的观点来适用法律，要处理好某一法律条文与相关法律条文之间、某一部门法与相关部门法之间的关系，以及该法律问题与案件事实、当前经济社会现实之间的关系；在纵向上要以发展的而不是静止的观点来适用法律，要尽可能捋清拟适用法律条文的

“前世今生”，并以此探究立法者的真实意旨。二是要特别注重法律适用方法的系统性。首先，要系统把握并综合运用文义解释、体系解释、历史解释、目的解释等法律解释方法。其次，要准确把握“上位法优于下位法、特别法优于一般法、新法优于旧法”等冲突法律规范选择适用规则，提高适用法律的精准性。最后，要准确把握法律溯及适用规则，处理好新旧法律的衔接适用问题，避免所适用的法律损害当事人的预期利益。

（一）关于法律解释方法的综合应用

“体系化的功能，不仅在于可对拟处理的资料获得较好之鸟瞰，以及较佳之掌握的可能性，而且为确保所认识之真知，体系化亦构成其唯一之可能途径，盖非经体系化，不能科学地思考或处理问题，并验证自思考或处理问题之经验中所取得的知识。”以合同效力体系为例，我国《民法典》将影响合同效力的因素区分为有效要件和生效要件：前者是指合同发生法律效力所必须具备的条件，即《民法典》第143条规定的“三要件”；后者是合同实际发生当事人所追求的法律效力应具

备的要件。由此，合同效力体系可以进一步分为两大类：

一类是具备有效要件的合同。一般情况下，合同具备有效要件，就可以发生当事人所追求的法律效力，但是在特殊情形下，合同有效但却因欠缺法律规定或当事人约定的特别生效要件而暂时不能发生当事人所追求的法律效力亦即履行效力，例如当事人就合同发生效力约定了条件或者期限，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合同只有经过行政部门审批才能发生效力。具备有效要件但不具备生效要件的合同为未生效合同，其与无效合同存在本质区别。未生效合同因已“依法成立”而不仅“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而且应“受到法律保护”，其不仅可以产生任何一方当事人不得擅自变更或解除合同以及不得恶意阻止或促成条件成就的消极义务，还可产生负有报批义务的一方履行报批手续等积极义务；而无效合同“自始不具有法律约束力”。

另一类则是欠缺有效要件的合同，还可以区分为无效、可撤销、效力待定合同。无效合同，主要是欠缺不违法或不违背公序良俗的要件。依据法律的具体规定，无效事由包

括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或违背公序良俗、虚假意思表示、完全无民事行为能力以及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合法权益。可撤销合同，是欠缺意思表示真实要件，主要是指合同一方意思表示不真实，具体包括因被欺诈、胁迫、重大误解及乘人之危显失公平的合同。在可撤销合同中，把合同是否有效的权利赋予意思表示不真实的当事人，由其根据有效还是无效对自己更有利而进行选择。虚伪意思表示虽也是意思表示不真实，但系双方或非单方意思表示不真实，因而属于无效合同。效力待定合同，是欠缺主体民事行为能力要件，具体包括限制民事行为能力及无权代理情况下签订的合同，其价值取向与可撤销合同类似。由此可见，对合同效力的判断，不能泛化地适用《民法典》第 143 条，以不具备合同有效要件为由认定合同无效，而应去寻找有关具体条款，以界定合同的具体效力状态。

在违法合同问题上，对违法问题的判断，从来都是一个疑难复杂问题，在我国就经历了一个相当复杂的发展过程。《民法典》第 153 条第 1 款在吸收司法实践经验的基础

上，就违反强制性规定的法律行为效力作了一个抽象的规定，即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但例外有效。对于“例外”的理解需要运用法律解释方法进行确定。而在此过程中，也必然涉及价值判断和利益衡量，尤其是要考虑当事人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究竟是仅需承担公法上的责任就可以实现该强制性规定的目的，还是也有必要通过否定合同效力来实现该强制性规定的目的。为此，《民法典合同编通则解释》在总结司法经验的基础上，规定五种情况属于“例外有效”范畴。比如，强制性规定不是为了保护合同当事人的民事权益，而是旨在维护政府的税收、土地出让金等国家利益或者其他民事主体的合法利益，认定合同有效不会影响该规范目的的实现。例如，开发商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39条第1款第一项规定未按照出让合同约定支付全部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即签订转让土地使用权的协议。司法解释所列举的五种情况是否能够穷尽“例外有效”的所有情况，有待实践进一步验证，但起码在《民法典》第153条第1款但书部分基础上为审

判实践提供了范例式指引。应予以注意的是，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可以归纳出几种强制性规定不必然导致合同无效的情况：其一，法律、司法解释明确规定违反强制性规定不影响合同效力，例如，当事人订立房屋租赁合同后，未依法办理备案登记，依据《民法典》第728条的规定，不应影响房屋租赁合同的效力；其二，当事人虽然违反强制性规定，但人民法院还要结合其他法律规定对行为性质进行认定，再在此基础上认定合同效力，例如，当事人违反《民法典》第399条关于有些财产不得抵押的规定，就需要根据具体情形结合其他法律的规定判断行为究竟是无权处分还是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再据此认定合同效力；其三，如果强制性规定旨在规范合同的履行行为，则合同原则上不因违反该规定而无效，除非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或者合同的履行必然违反强制性规定，例如，当事人违反《民法典》第612条关于出卖人权利瑕疵担保义务规定、第617条关于出卖人违反质量瑕疵担保义务的规定或者第716条关于承租人未经出租人同意转租的规定，都不应影响合同效力。

实践中，往往存在这样的法律事实：作为合同一方当事人的公司的代理人与相对人恶意串通，损害公司合法权益。对此种情况是否可以适用《民法典》第154条的规定，认定合同当然无效，这涉及文义解释的问题。第154条所称的损害“他人”合法权益，这个“他人”是否包括所代理的公司，从文义解释看，似乎不限于合同主体之外的第三人，还包括所代理的公司。一般情况下，这样的解释结论能够实现保护被损害合法权益的公司的立法目的，但联系特定法律事实，就未必了。比如，该代理人与相对人签订合同时恶意接受明显高出市场价格的交易价，但如果物价急剧上涨，在合同履行时当初约定的价格对所代理的公司更有利，如认定合同无效，反而会使参与串通的相对人获益。再比如，如果相对人为主合同提供担保物权，将因合同无效导致担保合同无效，会对无辜的一方当事人造成“二次伤害”，与立法目的也背道而驰。这就需要进一步寻求更为合理的解释路径：代理人与相对人恶意串通损害被代理公司利益，其显然已属无权代理（在相对人是善意的情况下不影响合同有效，但相对人是恶意

的情况下，毫无疑问是影响合同效力的），可以适用《民法典》第171条、第503条之规定，按效力待定来处理。此时，被代理的公司享有选择权，合同有效对自己有利的，可以追认；对自己不利的，则不予追认。按照这样的解释路径，显然能够在所有代理人与相对人恶意串通的情形，都能达到保护“他人”合法权益之目的。进一步考量的是，如果法定代表人与相对人恶意串通是否也可以沿袭这一思路，对《民法典》第504条进行目的扩张解释以作出类似处理，殊值深入探讨。

（二）关于《民法典》与商事特别法的适用关系

我国采取的是民商合一的立法体例，在《民法典》之外还存在大量商事特别法，在适用法律时必须以整体思维处理好二者之间的关系。一般来讲，在二者发生冲突的情况下，应当优先适用商事特别法的规定。不过，由于有些商事特别法是在《民法典》之前制定的，且其内容大量涉及一般性规则，并非仅仅适用于商事主体或者商事行为，这就可能同时产生新法优先于旧法的适用问题。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以下简称《公司法》）为例，该法制定于 1993 年，当时虽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关于法人的一般规定，但这些规定显然过于简单，无法满足实践的需要。在此背景下，《公司法》包含了大量法人制度尤其是营利法人制度的一般规则，实际上担负着构建法人制度尤其是营利法人制度一般规则的使命。在《民法典》制定过程中，立法机关将《公司法》中的一些条文经提炼或者修改后规定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但并未同时修改《公司法》，这就造成法律适用上的困难：一方面，根据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法律适用规则，应适用《公司法》；但另一方面，凡是《民法典》与《公司法》及其司法解释规定不一致的地方，显然又是立法者有意要修改法律，如果一概适用《公司法》及其司法解释，则立法者的上述目的显然无法实现。正因为如此，《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在坚持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前提下，规定了若干例外情形，以防止《民法典》对《公司法》所作的修改被架空。目前，《公司法》正在修订过程中，一旦完成修订，则《公司法》与《民法典》的关系，不再是旧的特别法与新的一般

法的关系，而是新的特别法与旧的一般法的关系。不论是基于新法优于旧法、还是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法律适用规则，修订后的《公司法》与《民法典》不一致的，应当优先适用《公司法》的规定。

再如，《民法典》施行后，我们还面临担保制度与破产制度的关系问题。《民法典》将所有权保留买卖、融资租赁、保理等规定为具有担保功能的合同，主要目的是通过登记制度来解决交易安全问题和担保物权之间的冲突问题。但是，所有权保留和融资租赁中的出卖人、出租人对标的物毕竟享有所有权，因此，在买受人、承租人破产的情况下，仍应认为出卖人、出租人享有取回权，只不过在行使该权利的同时，须承担清算义务。

（三）关于新旧法律、司法解释的衔接适用

《民法典》施行后，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人民法院都会面临新旧法律、司法解释的衔接适用问题。为解决这一问题，最高人民法院不仅发布了《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民法典时间效力司法解释》），

还于2021年4月发布了《全国法院贯彻实施民法典工作会议纪要》。但是,对于一些问题仍存在争议:第一种情况涉及《民法典时间效力司法解释》本身的理解与适用。例如,合同订立在《民法典》施行前,但违约行为持续到《民法典》施行后,应当适用《民法典》还是原来的《合同法》。这就涉及《民法典时间效力司法解释》第1条的理解与适用。笔者认为,合同成立是发生合同关系的法律事实,而违约并非引起合同关系的法律事实,因此合同纠纷案件的审理原则上还是应当适用合同成立时的法律。当然,根据《民法典时间效力司法解释》,如果《民法典》的相应规定具有溯及力,则应当适用《民法典》的规定。第二种情况涉及新司法解释的时间效力。关于新司法解释的溯及力,应根据司法解释涉及的问题区分两种情况处理:其一,如果新司法解释涉及的是《民法典》没有变化的规则,则新司法解释原则上溯及力,即溯及到该规则施行之时,但如果适用的是旧法,就只能将新司法解释的规定作为裁判说理的依据,不能作为裁判依据。例如,《民法典担保制度解释》第52条就抵押预告登记的效力作出了

规定,但预告登记制度早在《物权法》中就有规定,抵押预告登记的实践也早已有之,因此,尽管《民法典担保制度解释》是根据《民法典》制定的,但司法解释关于抵押预告登记效力的规定,也可以作为我们理解和适用《物权法》关于预告登记规定的依据。其二,如果新司法解释涉及的是《民法典》有变化的规则,则新司法解释是否有溯及力,应取决于《民法典》这一规则本身是否有溯及既往的效力,只有在《民法典》这一新规则有溯及力时,新司法解释的相应规定才有溯及力,否则就没有溯及力。例如,《民法典担保制度解释》第13条关于共同担保人之间相互追偿的规定,就应区分共同保证和混合共同担保:如果是共同保证,因《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及其司法解释与《民法典》的规定不一致,且《民法典》就这一问题的规定不具有溯及力,故《民法典担保制度解释》就不具有溯及力;但是对于混合共同担保,因《物权法》与《民法典》的规定并不冲突,《民法典担保制度解释》自然可以溯及到《物权法》施行之时。

李建伟|新公司法将对资本市场产生积极影响

——摘自《证券日报》

2023年12月29日，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修订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自2024年7月1日起施行。

公司法自颁布实施近30年来，历经四次修正、两次修订。此次修订对于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推动资本市场健康发展，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李建伟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新公司法将对资本市场产生积极影响。

首先，为资本市场注入稳定性。职工、中小股东合法权益保护得到进一步细化，公司治理的民主进程得以制度化固定。

其次，为资本市场注入了能动性。审计委员会的重大制度创新，不仅促进公司内部权力的妥善运行，还将提升公司治理的效率与透明度。

最后，为资本市场注入了时代性。科技创新与互联互通是重要的

时代特征，无纸化、电子化的会议与表决方式凸显时代潮流。

强化“关键少数”责任

新公司法强化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和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关键少数”的责任。

首先，新公司法明确了勤勉义务、忠实义务的具体内容。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郭雳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根据新公司法规定，勤勉义务的核心是“执行职务应当为公司的最大利益尽到管理者通常应有的合理注意”，忠实义务的核心是“不得利用职权谋取不正当利益”。

“勤勉义务是积极义务，要求尽到通常应有的合理注意。合理注意标准不能过高，也不宜过低。这要考察当事人依据其个人能力、经验等作出的判断是否合理可接受，符合公司最大利益。忠实义务则主要是消极义务，强调应该避免其个人利益与公司利益发生冲突。当存在利益冲突时，相关当事人不应该享有表决权，而须遵守回避规则。”郭雳进一步解释，明确行为标准可便利法院和市场监管机构更加精确地

定责执法，促进公司完善治理结构，形成良好的治理文化。

从域外公司法的实践和经验来看，华东政法大学国际金融法律学院教授郑彧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对忠诚义务的争议比较少，最主要的标准就是是否有“损公肥私”的行为。因此，本次公司法的修改在忠实义务上也就直接明确了禁止“利益冲突”的这条 主轴。但对于“勤勉义务”则没有全球统一的示范标准，英美法系主要通过法官的案例形成惯例性的标准，因此这次修法采用的是“应有的合理注意”这一标准，树立了何谓“勤勉”的一个基本画像。

其次，新公司法规定，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担任公司董事但实际执行公司事务的，对公司亦负有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

“这一规定是对有关公司‘事实董事’的规定，也就是说对于董事一职的责任不仅仅看是否有董事的‘名分’，还要看是否存在履行董事职务之实。”郑彧表示，这是为了防止“有心眼”的实控人利用他人的名义进行公司董事的对外登记公示，但却由其自己行使实际的公

司决策权，由此真正形成对于公司董事权利、责任和义务上的法律闭环。

李建伟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影子董事”是治理难题之一。新公司法以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为制度枷锁，将民法典中禁止滥用权利原则在公司治理领域中予以贯彻落实，有利于引导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正当行权，同时降低谋划不正当关联交易的动机，减少非法转移占有公司财产、破坏良好营商环境的行为。为公司其他股东保护合法权益，合法退出公司提供了规范依据，进而补足制度阙漏，明确了权利义务相统一的原则。

新公司法还加强对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公司关联交易等的规范，增加关联交易等的报告义务和回避表决规则；强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维护公司资本充实的责任；规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执行职务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给他人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等；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指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从事损害公司或者股东利益的行为的，与该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承担连带责任。

整体来看，新公司法优化了上市公司治理结构。郭雳表示，首先，董事的忠实义务、勤勉义务得到细化，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等“影子董事”“事实董事”也同样受到规范，大幅缓解“一股独大”的专断风险。其次，股东会职能被削弱而董事会职能增加，董事会在公司治理中的重要性和独立地位增强，有利于集体决策服务上市公司发展。再次，董事会的监督功能凸显，如监督股东缴资，可弥补监事会的能力缺陷，形成对上市公司事务的监督合力。最后，债券持有人更有途径参与到公司治理，增强了公司治理的债券市场约束。

强化中小股东保护

新公司法在中小股东权利保护方面做出多项规定，包括强化股东知情权，扩大股东查阅材料的范围；完善股份有限公司股东请求召集临时股东大会会议的程序，完善股东临时提案权规定，强化股东民主参与公司治理；对于公司控股股东滥用股东权利，严重损害公司或者其他股东利益的，规定其他股东有权请求公司按照合理的价格收购其股权；

公司减少注册资本，应当按照股东出资或者持有股份的比例相应减少出资额或者股份；允许股东对公司全资子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提起代表诉讼等。

“这些规定为在普遍集中的公司股权结构下保护中小股东权利‘添砖加瓦’，既是对过去我国公司治理实践的经验总结，也是进一步优化公司内部权力制衡、促进股权资本化流动、维护市场投资信心的必要举措。”郭雳表示。

李建伟表示，本次新公司法通过十多处制度规定，践行对中小股东保护这一重要的立法目的。一方面，未受通知股东请求撤销公司决议的权利得以完善。既增加了知道决议作出之日起六十日的除斥期间起算点，也规定了一年内未行使撤销权进而消灭的终止点。另一方面，引入双层股东代位诉讼，为保护中小股东权利提供了崭新的有效制度工具。

完善公司债相关规定

完善公司债券相关规定。根据《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决定》

将国家发展改革委企业债券审核职责划入中国证监会的要求，删去国务院授权的部门对公开发行债券注册的规定；明确公司债券可以公开发行，也可以非公开发行；将发行可转债的公司由上市公司扩大到所有股份有限公司；增加债券持有人会议决议效力的规定，增加债券受托管理人相关规定。

郑彧表示，本次公司法有关公司债的修改主要是为了与新证券法进行联动和呼应，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有关债券受托管理人法律地位的安排，明确了债券持有人的勤勉尽责义务，不得损害债券持有人利益的义务。“关于完善公司债的相关规定，比较突出的债券持有人会议制度以及债券受托管理人的聘任。”郭雳表示，该制度的影响是将债券持有人引入公司治理，丰富现有公司治理力量，拓展传统公司治理框架。

李建伟表示，新公司法对于公司债相关规定的优化，赋予了公司发行债券的灵活性，丰富了公司融资手段的多样化，为公司资本结构合理配置、债券市场有序发展提供了制度基础。新公司法确立注册制

为公开发行债券方式，将发行可转债主体扩张到股份有限公司，并调整无记名债券为记名债券，降低了发行门槛的同时，加强了证券市场的透明度。公司内部，聚焦债券持有人会议、债券受托管理人的新制度，以较为完善的信义义务为配套，构建起“外松内紧”的公司债管理体制，从制度层面帮助公司有效发行债券，盘活市场闲置资金，并以体系化制度保障投资者利益，向健全的现代企业制度不断迈进。

《公司法》修订解读及法律全文 ——摘自微信《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案例研究院》

2023年12月29日，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修订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自2024年7月1日起施行。

修改公司法的背景意义是什么？修改的亮点有哪些？实施好这部法律要抓紧开展哪些工作？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负责人回答了记者提问。

记者：修改公司法的背景意义是什么？

答：公司是最重要的市场主体，公司法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基础性法律。我国现行公司法于1993年制定，今年正值公司法颁布30周年。1999年、2004年对公司法个别条款进行了修改，2005年进行了全面修订，2013年、2018年对公司资本制度相关问题作了两次修改。公司法的制定和修改，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密切相关，对于建立健全现代企业制度，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公司法修改列入了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法制工作委员会组织成立由中央有关部门和专家学者组成的修改起草组，研究起草，形成修订草案。2021年12月，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了由委员长会议提请审议的公司法修订草案。2022年12月，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对修订草案进行了二次审议。2023年8月，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对修订草案进行了三次审议。2023年12月，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对修订草案进行了四次审议并通过了这部法律。

修改公司法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优化营商环境、加强产权保护、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等重大决策部署的需要，也是适应实践发展，不断完善公司法律制度的需要，修改公司法对于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起草工作注意把握以下几点：一是坚持正确政治方向。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对完善公司法律制度提出的各项任务要求，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为坚持和完善我国基本经济制度提供坚实法制保障。二是在现行公司法基本框架和主要制度的基础上作系统修改。保持现行公司法框架结构、基本制度稳定，维护法律制度的连续性、稳定性，降低制度转换成本；同时，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变化的新形势新要求，针对实践中的突出问题和制度短板，对现行公司法作系统的修改完善。三是坚持立足国情与借鉴国际经验相结合。从我国实际出发，将实践中行之有效的做法和改革成果上升为法律规范；同时注意吸收借鉴一些国家和地区公司法律制度的有益经验。四是处理好

与其他法律法规的关系。做好公司法修改与民法典、外商投资法、证券法、企业国有资产法以及正在修改的企业破产法等法律的衔接，并合理吸收相关行政法规、规章、司法解释的成果。

记者：此次修改公司法有哪些亮点？

答：公司法修改，坚持问题导向，总结实践经验和理论成果，为便利公司投融资、优化治理机制提供更为丰富的制度选择，规范公司的组织和行为，强化各方主体责任，切实维护公司、股东、职工和债权人的合法权益，亮点纷呈，有许多制度创新和解决实际问题的举措。

完善公司资本制度。一是完善注册资本认缴登记制度。规定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出资期限不得超过五年。根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的意见，授权国务院制定具体办法，对新法施行前已登记设立且出资期限超过本法规定期限的公司设置过渡期，要求其将出资期限逐步调整至本法规定的期限以内。二是在股份有限公司中引入授权资本制，允许公司章程或者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发行股份，同时要求发起

人全额缴纳股款，既方便公司设立、提高筹资灵活性，又减少注册资本虚化等问题。三是规定股份有限公司可以发行优先股和劣后股、特殊表决权股、转让受限股等类别股。四是允许公司根据章程择一采用面额股或者无面额股。五是允许公司按照规定使用资本公积金弥补亏损。六是规定简易减资制度，允许公司按照规定通过减少注册资本方式弥补亏损，但不得向股东分配，也不得免除股东缴纳出资或者股款的义务。七是增加股东未按期缴纳出资的失权制度、股东认缴出资加速到期制度，规定股权转让后转让人、受让人的责任。

优化公司治理。一是允许公司只设董事会、不设监事会，公司只设董事会的，应当在董事会中设置审计委员会行使监事会职权。二是简化公司组织机构设置。对于规模较小或者股东人数较少的公司，可以不设董事会，设一名董事，不设监事会，设一名监事；对于规模较小或者股东人数较少的有限责任公司，经全体股东一致同意，可以不设监事。三是为更好保障职工参与公司民主管理，规定职工人数三百人以上的公司，除依法设监事会并有公司职工代表的外，其董事会成员中

应当有公司职工代表。公司董事会成员中的职工代表可以成为审计委员会成员。四是对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和上市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的议事方式和表决程序作了规定。

加强股东权利保护。一是强化股东知情权。扩大股东查阅材料的范围，允许有限责任公司股东查阅会计凭证，股份有限公司符合条件的股东查阅会计账簿和会计凭证，允许股东查阅、复制全资子公司相关材料。二是完善股份有限公司股东请求召集临时股东大会的程序，完善股东临时提案权规定，强化股东民主参与公司治理。三是对于公司的控股股东滥用股东权利，严重损害公司或者其他股东利益的，规定其他股东有权请求公司按照合理的价格收购其股权。四是规定公司减少注册资本，应当按照股东出资或者持有股份的比例相应减少出资额或者股份，法律另有规定、有限责任公司全体股东另有约定或者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另有规定的除外。五是允许股东对公司全资子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提起代表诉讼。

强化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和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责任。一是完善忠实和勤勉义务的具体内容。二

是加强对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公司关联交易等的规范，增加关联交易等的报告义务和回避表决规则。三是强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维护公司资本充实的责任。四是规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执行职务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给他人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五是规定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担任公司董事但实际执行公司事务的，对公司负有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六是规定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指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从事损害公司或者股东利益的行为的，与该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承担连带责任。

完善公司设立、退出制度。一是新设公司登记一章，明确公司设立登记、变更登记、注销登记的事项和程序；同时要求公司登记机关优化登记流程，提高登记效率和便利化水平。二是充分利用信息化建设成果，明确电子营业执照、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发布公告、采用电子通信方式召开会议和表决的法律效力。三是扩大可用作出资的财产范围，明确股权、债权可以作价出资。四是放宽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设立等限制，并允许设立一人股份有限公司。五是完善公司清算

制度，明确清算义务人及其责任。六是增加简易注销和强制注销制度，方便公司退出。

完善国家出资公司相关规定。一是设国家出资公司组织机构的特别规定专章，将适用范围由国有独资有限责任公司，扩大到国有独资、国有资本控股的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二是坚持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强调国家出资公司中中国共产党的组织的领导作用。三是要求国有独资公司董事会成员中外部董事应当过半数。四是规定国有独资公司在董事会中设置由董事组成的审计委员会行使监事会职权的，不设监事会或者监事。五是增加国家出资公司应当依法建立健全内部监督管理和风险控制制度的规定。

完善公司债券相关规定。一是根据《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决定》将国家发展改革委企业债券审核职责

划入中国证监会的要求，删去国务院授权的部门对公开发行债券注册的规定。二是明确公司债券可以公开发行，也可以非公开发行。三是将发行可转债的公司由上市公司扩大到所有股份有限公司。四是增加债券持有人会议决议效力的规定，增加债券受托管理人相关规定。

记者：实施好修订后的公司法要抓紧开展哪些工作？

答：实施好修订后的公司法，意义重大。

公司法修改增加很多新制度，对于方便公司投融资和优化治理具有重要意义，各有关方面要积极做好宣传解读，加快制定配套规定，确保法律正确有效实施。

如您对本资料有任何意见或建议，请联系：徐倩倩 qianqian.xu@mhplawyer.com